

※研究動態※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 《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

關家錚*

一、前言

「俗文學」一詞據說是日本漢學家狩野直喜博士(1868-1947)最早提出的，他在一九一六年《藝文》第七卷第一、三期上發表的〈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一文中說：「治中國俗文學而僅言元、明、清三代戲曲小說者甚多，然從敦煌文書的這些殘本察看，可以斷言，中國俗文學之萌芽，已顯現於唐末五代，至宋而漸推廣，至元更獲一大發展。」¹ 敦煌遺書中的俗文學材料成為中國俗文學之一部分的重要地位，也就從而被指出。將「俗文學」引入研究者的視野，這不僅大大拓展了文學史料的範圍、畛域，也促成了人們文學觀和文學史觀的變革。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胡適(1891-1962)在《白話文學史·自序》中說：「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寫本的俗文學，經羅振玉先生、王國維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經有許多篇可以供我們採用了。……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的中國俗文學的史料。」² 這或許是國內學者較早使用「俗文學」一詞。一九二九年鄭振鐸先生利用早期敦煌文學的輯佚和研究成果，把敦煌石窟所發現的各種通俗文學作品統稱為「俗文學」，寫了〈敦煌的俗文學〉³。這些新的文學樣式有著絲毫不低於傳統詩

* 關家錚，山東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¹ 見嚴紹盪：〈狩野直喜和中國俗文學研究〉，《學林漫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集，頁142-152。

² 見胡適：《白話文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1-10。

³ 見1929年《小說月報》第20卷第3號，後收入《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3章。

文的藝術價值，打破固有的文章體制，從學理上予以重新整合，以建立新的文學觀。之後，鄭振鐸先生試著寫一部以反映「中國文學的整個發展過程和真實面目」的中國文學史，一九三〇年五月商務印書館印行《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上）提到：「據作者自稱，原想編一部能顯示出真實面目的中國文學史，年出二冊，於五、六年後完成，因故僅出了一冊而終止，一二八事變時，本書版子毀於炮火。」⁴ 鄭振鐸先生計畫寫作的「大文學史」遭日本侵略軍焚毀後，於是以「急就章」的方式，寫了《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⁵。在這部書裏，他首次把歷來不為文人雅士們所重視的彈詞、寶卷、小說、戲曲等，被「正統文學」視為不能登入文學殿堂的所謂「俗文學」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寫了進去，以他獨到的科學見解，為「俗文學」正了名，不僅填補了我國文學史的空白，並為「俗文學」爭得了在文學殿堂中應有的席位。一九三四年六月，鄭振鐸在《文學》月刊第二卷第六號「中國文學研究專號」上，又寫了〈三十年來中國文學新資料的發現史略〉一文⁶，將三十年來發現的新資料，以宋元詞集、敦煌變文、寶卷、彈詞、鼓詞、民歌俗曲、諸宮調、戲曲、散曲、小說、詩文及其他要集等十一類進一步論述，其中除首尾兩類之外，應當都是俗文學的門類。史料的拓展與觀念的更新是相輔相成的，它們共同構成中國文學史由傳統向現代轉化的樞紐，「俗文學」的概念、理論也應運而形成。

鄭振鐸在總結近三十年來中國文學新資料之後，不滿足於資料長編式的歷史堆積，他沉思既久、蓄積良多，對於中國俗文學史選取範圍的認識，以「因為如今還

⁴ 陳玉堂編：《中國文學史舊版書目提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85年），頁47。

⁵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平：北平樸社，1932年）正如這本書在〈自序〉和〈例言〉中所述：「本書所包羅的材料，大約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其他書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變文，宋、元的戲文與諸宮調，元、明的講史與散曲，明、清的短劇與民歌，以及寶卷、彈詞、鼓詞等等皆是。」這裏提到了寶卷、彈詞、鼓詞等俗文學體裁，是該書在傳統中國文學史內容上的突破。遺憾的是對寶卷、彈詞、鼓詞等尚未論述到，〈近代文學卷〉部分未敘述完。

⁶ 1934年6月，鄭振鐸在《文學》月刊第2卷第6號「中國文學研究專號」上發表〈三十年來中國文學新資料的發現史略〉，在這篇主要從資料角度，對作為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文學研究，所進行的宏觀回顧的長文中，鄭振鐸將三十年來發現的新資料分成十一類講述，即宋元詞集、敦煌變文、寶卷、彈詞、鼓詞、民歌俗曲、諸宮調、戲曲、散曲、小說、詩文及其他要集，其中除首尾兩類之外，差不多都是俗文學的門類。

不曾有過一部比較完備的中國文學史，足以指示讀者們以中國文學的整個發展的過程和整個真實的面目的呢」（《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自序》）。中國文學史缺少的正是俗文學這部分，以及其對於整個大中國文學史的獨特認識，至一九三八年，鄭振鐸先生《中國俗文學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版）的出版，從理論上論述俗文學範圍、性質、內容、發展、分類，這為中國俗文學史研究體系奠定了基礎，開創了俗文學專門史的研究，使得廣泛影響的一門新學科——「中國俗文學」被學術界廣泛傳播和認同，遂標誌了「中國俗文學」這個學科得以正式確立。由此，文學藝術工作者們對中國俗文學研究的興趣日趨濃厚，許多學者衝破傳統觀念的束縛，逐漸開始對存世的俗文學資料進行系統的發掘、整理和研究。並且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幾家主要報刊的大力支持下，先後出現了阿英主編的《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⁷、戴望舒主編的「港字號」《俗文學》周刊、趙景深主編的「滬字號」《俗文學》周刊以及傅芸子、傅惜華主編的「平字號」《俗文學》周刊⁸，形成了俗文學研究方興未艾的情勢，這就成了組成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強大的文學藝術研究思潮中的一部分。在論述現代中國俗文學研究的興起，以及之後從中國俗文學研究發展起來成為獨立研究的領域，都無法繞開其時代傳媒所提供的園地與推波助瀾。即便是獨立不羈的文人學者，也無不與報刊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中國俗文學研究發展的沿革以及學術歷程更是由此顯示出來。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大晚報》在上海創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創辦人張竹平（1886-1944）、曾虛白（1894-1994）⁹。曾虛白任《大晚報》總經理

⁷ 阿英原名：錢德富，錢德賦（上學後）、錢杏邨（寫文章後）；曾用筆名：寒星（1928）、牟殊（1928）、島田（1928）、若英（1930）、張若英（1930）、錢謙吾（1930）、若虛（1930）、方英（1931）、黃英（1931）、戴淑清（1931）、阿英（1932）、黃錦濤（1932）、戴渭清（1932）、徐衍存（1933）、張鳳吾（1933）、鳳吾（1933）、阮無名（1933）、殊（1934）、魏育（1934）、寒峰（1934）、王英（1935）、吳均（1936）、德均（1936）、李晦（1936）、李饒（1936）、遂初（1936）、鷹隼（1938）、寒峰居士（1938）、魏如晦（1939）、李健吾（編輯《離騷》雜誌借用一次）、丁君吾（電影《時代的兒女》編劇夏衍、鄭伯奇、阿英三人用名）、南強編輯部（1932年《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編輯時寫序用）。

⁸ 吳曉鈴：〈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學〉，《華北日報·俗文學》第60期，1948年8月20日。為最早區分不同地區出版的《俗文學》周刊，而提出「港字號」、「滬字號」、「平字號」《俗文學》周刊稱謂。

⁹ 上海新聞志編纂委員會編：〈人物志〉，《上海新聞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10編。

兼總主筆¹⁰。當時「《大晚報》在日報中固然是個晚輩，在夜報中卻是老大哥」¹¹。這主要是因為當時報刊的欄目很多，較為引人矚目，吸引了很多的讀者。其中《大晚報》副刊是由崔萬秋(1903-1982)具體負責，主編副刊《火炬》、《剪影》¹²，而該副刊《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版，則是由錢杏邨(阿英，1900-1977)具體負責主編的。金性堯先生(1916-)在該刊發表過許多時事歌謠，筆者曾經去信，詢問該刊的一些情況，金先生於二〇〇三年六月二日給筆者的信中說，該副刊的「通俗文學」版，就是由阿英具體負責主編的。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趙景深先生(1902-1985)在《大晚報·通俗文學》周刊第一期〈復刊詞〉一文中說：「這周刊本是魏如晦(阿英)兄主編的，現在由我來繼續下去。」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上海《大晚報》在第五版刊登出一則啟事，「請注意明日：《火炬通俗文學》第一期要目預告：〈論通俗文學的整理〉西諦、〈建設新的通俗文學(一)〉鄭伯奇、〈關於《廣笑府》〉周作人、〈記嘉靖本《翡翠軒》及《梅杏爭春》(上)〉阿英、〈《北平俗曲略(介紹)》〉且同」。次日(四月三日)，錢杏邨(阿英)主編的《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創刊第一期，刊載於第五版，刊頭題有「火炬通俗文學」字樣，通常六欄，約五千字，自第二期後改為每星期三出版，一共連續刊出了四十期，延續到十二月三十日結束。此周刊的出版對於其後「滬字號」、「滬字號」、「平字號」等《俗文學》周刊，可說起了啟迪的作用¹³。然而，對於這一周刊歷來知者甚少，無人提及；自然也就更沒有人論述二十世紀上半葉先後共有六種《俗文學》周刊出版的實際情況¹⁴。這類資料之所

¹⁰ 同前註。

¹¹ 見〈《大晚報》五周年紀念特刊〉一文，《大晚報》，1937年2月12日第五版。

¹² 上海新聞志編纂委員會編：〈人物志〉，《上海新聞志》，第10編。

¹³ 趙景深先生指出「俗文學以定期刊物的姿態出現，最早恐怕要算魏如晦(阿英)所主編的《通俗文學》約民國二十五年在《大晚報》，每週出版」。見〈「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學」——兼談滬版俗文學刊物三種〉一文，北平《華北日報·俗文學》第68期，1948年10月15日。

¹⁴ 王文寶：《中國俗文學發展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頁263-264。僅沿用了吳曉鈴先生的〈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學〉一文所述，沒有論及阿英主編的《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以及趙景深主編的上海《神州日報·俗文學》周刊，而對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香港、上海、北平出版的六種《俗文學》周刊的實際研究情況的敘述均缺略。婁子匡、朱介凡：《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臺北：正中書局，1963年)，此書也未詳盡記錄這一時期《俗文學》周刊的研究情況，沒有論及阿英主編的《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戴望舒主編的香港《星

以一直不為學人們所關注，原因頗多，其一，因為它們是上個世紀大動盪時期的報紙副刊，全部保留下來剪存的幾乎沒有了。其二，現在事隔半個多世紀，尚健在且瞭解全部情況的前輩學者也不多了。其三，「況且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正是中國學術論文記錄做得最差的一段時期，處處空白，最近見到的港版《中國史學論文索引第二編》（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〇年出版），雖然基本上彌補了此一缺陷，工作還是做得不夠理想。幾種俗文學副刊中的論文一篇也沒有收進。一份完整記錄的必要，自不待言」¹⁵。筆者根據學術史研究工作的需要，在整理家藏俗文學資料時，較系統的收集、整理出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這一時期較完備的《俗文學》周刊資料。為了對俗文學研究學術史補苴罅漏，籍此盛世，聊盡區區愚誠，現將檢得全部《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資料的史實公諸於世，這對於深入研究俗文學，促進其發展，以及研究中國俗文學學術史，一定有助益。

二、周刊內容

錢杏邨（阿英）主編的《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於民國二十五（1936）年四月三日創刊。此時，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團結抗日的愛國救亡運動席捲全國；在經歷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學術思想的活躍與傳播，為學術研究創設了一個發展的大環境下，適應形勢與學術交流所需，學術刊物的創辦勢在必然。俗文學研究既有學術性，同時也能反映出民族性。此時期的其他學術刊物或報紙副刊，作為專門以適應形勢又研究俗文學功能的似乎非常有限，要求有新的學術園地，而且要求拓展專門的學術園地，《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於是就在這種時代需求下出現了。

錢杏邨（阿英）主編的《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其編輯思想，在查閱現存該刊全部內容後，發現編者並沒有具體敘述；然而，從該刊前六期推出的西諦（鄭振鐸）的〈論通俗文學的整理〉、鄭伯奇的〈建設新的通俗文學〉（此後還寫

島日報·俗文學》周刊以及趙景深主編的上海《神州日報·俗文學》周刊；整體對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香港、上海、北平出版的六種《俗文學》周刊的研究情況敘述亦均缺略。

¹⁵ 詳見馬幼垣先生〈香港星島日報俗文學副刊全目——附解題〉一文，黎樹添等編：《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文集》（香港：香港大學書報社，1982年），頁98-108。這是研究俗文學學術史的第一篇評介《俗文學》周刊的論文，此前並無論述研究《俗文學》周刊課題的論文。

了〈展開通俗文化運動〉，《大晚報·火炬》欄目，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第五版）¹⁶，以及顧仲彝的〈關於通俗文學的一個建議〉等文章，首先試圖從俗文學理論上，進一步加以論述，這對於當時以及其後的俗文學研究以理論為指導地開展，無疑起了推動的作用。另外，由周作人〈關於《廣笑府》〉¹⁷、阿英〈記嘉靖本《翡翠軒》及《梅杏爭春》〉和〈嘯嘯戲研究的小結束〉、趙景深〈嘯嘯戲目〉、陳志良〈中印寓言的影響〉、且同（金祖同）〈磨難曲〉、劉聿功〈彈詞雜論〉等有關探討地方戲、小說、彈詞、俗曲方面的文章看來，在中國俗文學學科逐步確立的初期，重視俗文學的研究正是這一時期學術研究的新走向，它拓展了文學研究的領域，豐富了文學研究的內容，可說體現了主編的編輯思想；也如阿英在一九三五年彈詞研究中指出：「彈詞一類的書，難入知識分子的眼，實則彈詞影響大，其所具藝術性，是不亞於所謂『大文學』。……其細緻雅韻，實臻『大文學』所不能達到的境地，而傳播的廣遠，尤非『大文學』所能望其項背。」¹⁸這裏阿英所說的「大文學」，也就略同於正統文學。這一時期，阿英的學術研究中對於彈詞、大鼓書、梨花大鼓、民歌、時調、拍板歌等均有專文研究，敢於肯定俗文學價值和文學地位，對於轉變學術界輕視俗文學研究的傳統觀念、推動俗文學研究的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俗文學和正統文學共同構成中國文學史全貌，這一觀點，恰好也反映出主編者的俗文學觀，同時也反映了，為促成俗文學研究這個新的學科的形成必要性的認識。隨後在第七期，刊出一則啟事「本刊徵求通俗文學作品，體例不拘，字數最好不超過四千，能一期登完。又，有關於通俗文學的各種文字，及地方大眾藝術的研究與報告，亦所歡迎。發表後並略致薄酬。不合用稿，附有郵費，當隨時寄還。稿面請書明『火炬通俗文學』編輯部收」。從而明確了擴大周刊的稿件範圍。從此之後的周刊，即刊出了通俗文學作品、寶卷、民間故事、歌謠等的研究文章和實地俗文學的民間調查報告，以引起學術界對俗文學關注的較大反響。從這裏，可

¹⁶ 鄭伯奇文集編委會編：《鄭伯奇文集》（西安：陝西文藝出版社，1988年），未收入二篇文章；王延晞、王利編的《鄭伯奇研究資料》中「目錄索引」部分的〈鄭伯奇著譯繫年目錄〉中，把〈展開通俗文化運動〉一文誤為〈展開通俗化運動〉；「〈建設新的通俗文學〉（文藝論文）載1936年4月3日、4月8日上海《大晚報·火炬》」。其實，應為《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第1、2期。

¹⁷ 查閱到已經出版的周作人著作，未收入此文章。

¹⁸ 阿英：〈重刊《庚子國變彈詞》序〉，《小說二談》（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頁77。

以體會出主編者在辦刊的方針上，始終體現著促進俗文學研究健康發展的編輯思想，保持著不斷追求新的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和成果，遂使《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具有了生機和活力。這是中國俗文學研究發展史上第一份學術周刊，為了便於研究者瞭解，現將該刊全部文章篇目列出，並對部分文章略作敘錄如下：

(一) 篇目

第 1 期 1936 年 4 月 3 日 星期五 五版

論通俗文學的整理	西 諦
建設新的通俗文學（上）	鄭伯奇
關於《廣笑府》	周作人
記嘉靖本《翡翠軒》及《梅杏爭春》（上）	阿 英
介紹李家瑞著《北平俗曲略》	且 同（金祖同）

第 2 期 1936 年 4 月 8 日 星期三 五版

建設新的通俗文學（下）	鄭伯奇
記嘉靖本《翡翠軒》及《梅杏爭春》（下）	阿 英
所謂徐文長的《諧史》	趙景深
啟：《通俗文學》自本期起，改於每星期三附「火炬」發刊，請讀者注意。	

第 3 期 1936 年 4 月 15 日 星期三 六版

「蹦蹦」、「落子」、「評戲」	想阿寶
跋「蹦蹦」、「落子」、「評戲」	阿 英
蹦蹦戲目（上）	趙景深

第 4 期 1936 年 4 月 22 日 星期三 五版

浙東訪小說記	阿 英
--------	-----

啟：本期尚有趙景深先生〈蹦蹦戲目〉下篇，因篇幅關係不及排進，移入下期。

第 5 期 1936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三 六版

彈詞雜論	劉聿功
中印寓言的影響	陳志良
我也談談蹦蹦戲	魯男子

第 6 期 1936 年 5 月 6 日 星期三 五版

關於通俗文學的一個建議	顧仲彝
-------------	-----

- | | |
|---|----------|
| 《磨難曲》 | 且 同（金祖同） |
| 蹦蹦戲目（下） | 趙景深 |
| 蹦蹦戲研究的小結束 | 阿 英 |
| 第 7 期 1936 年 5 月 13 日 星期三 五版 | |
| 外國人看中國戲 | 趙景深 |
| 《欽命江南》 | 寒 峰（阿英） |
| 「滿江紅」雜曲 | 阿 英 |
| 通俗作品——《漢奸列傳》 | 嘿 生 |
| 本刊徵求通俗文學作品，體例不拘，字數最好不超過四千，能一期登完。又，有關於通俗文學的各種文字，及地方大眾藝術的研究與報告，亦所歡迎。發表後並略致薄酬。不合用稿，附有郵費，當隨時寄還。稿面請書明「火炬通俗文學」編輯部收。 | |
| 第 8 期 1936 年 5 月 20 日 星期三 五版 | |
| 再談清末時調 | 阿 英 |
| 蹦蹦戲目補 | 趙景深 |
| 談傀儡戲 | 旅 岡（盧豫冬） |
| 馬如飛開篇佚稿 | （原姓名不詳） |
| 《漢奸列傳》 | 嘿 生 |
| 第 9 期 1936 年 5 月 27 日 星期三 六版 | |
| 《漢奸列傳》 | 嘿 生 |
| 火炬讀書室——關於《譯文》 | 琴 心 |
| 《一法通》中之巧對 | 陳子展 |
| 長城謠 | 于時夏（陳子展） |
| 第 10 期 1936 年 6 月 3 日 星期三 五版 | |
| 杜十娘沉箱以後 | 且 同（金祖同） |
| 《珍珠塔》版本彙目 | 阿 英 |
| 《漢奸列傳》 | 嘿 生 |
| 〈打彈弓〉 | 玄 |
| 第 11 期 1936 年 6 月 10 日 星期三 五版 | |
| 時事開篇 | 阿 英 |

- 〈黃花岡紀事〉——介紹一篇廣東的「拍板歌」 寒 峰（阿英）
- 江南是否有石器？ 吳越人
- 江蘇民間故事 陳志良
- 通俗知識講話——求雨的奴隸 殷 人
- 《漢奸列傳》 嘿 生
- 第 12 期 1936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三 五版
- 民族解放進行曲：配合著永續不斷之戰鬥精神的「鏈鎖體」
- 一個歌曲新形式的試作 施 誼（孫師毅）
- 再記杜十娘沉箱以後 且 同（金祖同）
- 江蘇的民間故事 陳志良
- 《近百年中國國防文學史》自序 阿 英
- （版畫）難民收容所 紹 洛（王紹洛）
- 第 13 期 1936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三 六版
- 悼高爾基 翔
- （畫）寫了「四十年」的高爾基 蘇聯 Boris Elimov 作
- 《自由結婚》——介紹一部反帝反漢奸的小說 阿 英
- 平江的山歌 伯 韓（曹伯韓）
- 古代農民的叫喊
- 《詩經》「七月流火」故事的試譯 金性堯
- 第 14 期 1936 年 7 月 1 日 星期三 五版
- 孔夫子選女婿 陳子展
- 「不過是幾幅舊畫而已」請看三十年前之中國 嘿 生
- 清人小調輯逸 牟
- 秦始皇趕山頭——江蘇民間故事流傳於青浦 陳志良
- 第 15 期 1936 年 7 月 8 日 星期三 五版
- 《活地獄》——一部暴露監獄黑暗的小說 阿 英
- 一首民間流行的新歌 金 寶
- 江蘇的民間故事——上海的自然神話 陳志良
- 〈沈六官〉 狂 絲
- 第 16 期 1936 年 7 月 15 日 星期三 五版

- | | |
|-------------------------------|----------|
| 《痛史》——再介紹一部反漢奸的小說 | 阿 英 |
| 清人小調輯逸 | 牟 |
| 漢奸列傳 | 嘿 生 |
| 談打油詩 | 金性堯 |
| 第 17 期 1936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三 六版 | |
| 《海天鴻雪記》——李伯元的一部吳語小說 | 阿 英 |
| 民間的長山歌 | 施 沖 |
| 談四明文書 | 金性堯 |
| 第 18 期 1936 年 7 月 29 日 星期三 五版 | |
| 《熱血痕》——一部種族革命運動的小說 | 遂 初（阿英） |
| 《女舉人傳》 | 阿 英 |
| 彈詞開篇輯逸 | 牟 |
| 第 19 期 1936 年 8 月 5 日 星期三 五版 | |
| 《今古奇聞》中的「林蕊香」 | 均（葉德均） |
| 《小說閒談》阿英著 | 葉德均 |
| 江蘇的民間故事 | 陳志良 |
| 第 20 期 1936 年 8 月 12 日 星期三 五版 | |
| 《施公案》考證 | 趙景深 |
| 第 21 期 1936 年 8 月 19 日 星期三 五版 | |
| 《海上花列傳》 | 趙景深 |
| 〈十別〉 | 狂 絲 |
| 關於王寶釧和她的丈夫 | 金性堯 |
| 第 22 期 1936 年 8 月 28 日 星期五 五版 | |
| 晚清小說雜話 | 阿 英 |
| 記故鄉的唱新聞 | 金性堯 |
| 看報謠 | 毛 桿（金性堯） |
| 第 23 期 1936 年 9 月 2 日 星期三 五版 | |
| 《負曝閒談》 | 阿 英 |
| 江蘇的民間傳說——顧爛頭流傳於上海 | 陳志良 |
| 記故鄉的唱新聞（續） | 金性堯 |

- | | | | |
|--------|----------------------------------|-------------------------|-----------|
| 第 24 期 | 1936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五 五版 | 巧車謠 | 毛 桿 (金性堯) |
| | | 「鼓子詞」雜話 | 葉德均 |
| 第 25 期 | 1936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三 五版 | 孟姜女傳說的種種 | 陳志良 |
| | | 「花鼓戲」的史料 | 黃 勻 |
| | | 「宣卷」——上海民間文藝漫談之一 | 陳志良 |
| | | 新歌禮讚 | 金性堯 |
| 第 26 期 | 1936 年 9 月 30 日 星期三 五版 | 《說書小史》 | 黃 勻 |
| | | 開學謠 | 金性堯 |
| | | 《宦海升沉錄》 | 阿 英 |
| 第 27 期 | 1936 年 10 月 7 日 星期三 五版 | 小說作家考略一、天花藏主人 | 阿 英 |
| | | 梅州的一個民間傳說——一個老婆換一條魚 | 凡海筆錄 |
| | | 《警富新書》與《九命奇冤》 | 李 饒 |
| 第 28 期 | 1936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三 五版 | 名媛謠 | 毛 桿 (金性堯) |
| | | 藏說偶記 | 李 晦 (阿英) |
| | | 〈徐大郎〉 | 狂 絲 |
| 第 29 期 | 1936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三 (實際為星期五) 五版 | 《法國女英雄彈詞》 | 吳 均 |
| | |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 阿 英 |
| 第 30 期 | 1936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三 五版 | 介紹一部關於婦女問題的小說——頤瑣的《黃繡球》 | 李 晦 (阿英) |
| | | 記《小慧集》 | 毛 桿 (金性堯) |
| 第 31 期 | 1936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三 五版 | 關於《西湖二集》 | 趙景深 |
| | | 藏說小話 | 李 晦 (阿英) |
| | | 打春者之歌 | 喬 林 |

本刊下期專刊〈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先生〉（張若英）全文長六千言一次登完。

第 32 期 1936 年 11 月 4 日 星期三 五版

- 從大鼓到蹦蹦——《槍斃小老媽》的形成 趙景深
 關於秋瑾的戲曲補（上） 阿 英
 《中國小說史料》（孔另境編） 鄒 嘯（趙景深）
 啟：本刊因積稿太多，上期預告之〈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先生〉一文改移下期發表，敬希讀者原諒。

第 33 期 1936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三 五版

- 評《中國小說史料》（孔另境編） 德 均
 飛機四字謠 金性堯
 關於小說《轟天雷》的主人公沈北山 阿 英

第 34 期 1936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三 五版

- 木刻《一個人的受難》插歌 金性堯
 《洛陽橋》 陳志良
 北平的喜歌 趙景深

第 35 期 1936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三 五版

- 《梵天廬叢錄》中的賽金花——《孽海花》雜話之一 李 晦（阿英）
 關於改良民眾讀物 若 愚
 寶卷提要 陳志良
 《琵琶行》的戲文 阿 英

第 36 期 1936 年 12 月 2 日 星期三 五版

- 賽金花新謠 金性堯
 清末小說上的反康梁活動——小說雜話之一 李 晦（阿英）
 《雅觀樓》 阿 英

第 37 期 1936 年 12 月 9 日 星期三 五版

- 支那的小販 金性堯
 悼賽金花及其他 毛 桿（金性堯）
 寶卷提要（續） 陳志良
 評《中國小說史料》（續） 阿 英

小說瑣記	李 晦（阿英）
第 38 期 1936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三 五版	
小說作家與小說人物	阿 英
第 39 期 1936 年 12 月 23 日 星期三 五版	
北平的兒歌	趙景深
小說作家與小說人物（續）	阿 英
雜談《壯志凌雲》	小 維
人事通問	
第 40 期 1936 年 12 月 30 日 星期三 五版	
一九三六年中國通俗文學的發展	阿 英
《莊諧叢錄》中之小說資料	李 晦（阿英）
寶卷提要（續）	陳志良

（二）敘錄

西 諦（鄭振鐸，1898-1958）：

〈論通俗文學的整理〉刊載於第一期，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星期五，五版。本文署名西諦，即鄭振鐸。文章較早地（所著《中國俗文學史》出版前）對於俗文學理論加以論述：「我們的文壇向來對於通俗文學是最看不起的。戲曲、小說有系統的研究，不過是近幾年的事。至於彈詞、寶卷、鼓詞以及民間歌曲的整理卻還是最近的事——而且即在最近也還很少人著手。」對於彈詞、鼓詞，作者又進一步論述：「許多人至今也還看不起彈詞、鼓詞一類的東西，以為不足一顧。彈詞體的韻句乃被視作最卑下的韻格，談起來總要加以鄙笑。彈詞、鼓詞等的韻格是最鄙下的麼？用這種韻格寫乃無一部傑作在其中麼？我覺得最壞的一部彈詞或鼓詞也要比最壞的無聊的詩文集高明些。」「彈詞的重要作品卻極多，隨意的舉些出來，便如《天雨花》、《筆生花》、《再生緣》、《鳳雙飛》以來的出於女性作家們手下的偉大的著作，有如《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一類的弘偉的史詩，有如《珍珠塔》、《三笑姻緣》一類的吳語的傑作，……鼓詞慷慨激昂的著作尤多。一部《水滸傳》的鼓詞裏較小說尤足撼動平民的心魂，《亂柴溝》、《羅家將》一類的長篇大幅的史詩，確能抓住北方人民的心理，同樣的也能為一般有文學修養的

人所愛好」。接著對於寶卷又加以敘述「只有寶卷，因為帶的宗教性太濃厚，讀起來覺得有些不耐煩，而且教訓意味也太多，藝術的技巧因之大大的受了限制，難得有幾部是好的東西，但像《土地寶卷》一類的『啼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東西，是正統派的作品裏很難得見到的」。對於俗文學作品「只要肯去整理，一定是可以有空前的成績出來的」。「新的改作的，或整理後的通俗文學的作品是可以盡很大的責任的。人民之不能脫離『文學』，亦猶如魚之不能脫水的。正統派的文人們放棄了群眾，那些通俗作家便乘機遷入於其中了，同樣的新的作家們如果離開人民，那末，那些舊的作家們自然也便依然在抓住群眾了」。文章最後對於整理研究俗文學，提出了一點想法，論述：「第一，自然的蒐集，有了多量的蒐集來的資料在手頭，方可以談得到整理。第二，是編目或作提要。這是進一步的工作；就蒐集所得，加以初步的審閱及登錄。第三，是選擇，從無數的平庸的作品裏仔細的加以選拔，選出比較好些的東西出來。第四，是將選擇，加以推薦或經翻印。使一般人民可以得到許多無毒的弘偉的讀物。在一時新的讀物未能多量產生的時候，比較無毒的舊讀物仍是很需要的。」

鄭伯奇 (1895-1979)：

〈建設新的通俗文學〉刊載於第一、二期，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星期五，五版；一九三六年四月八日，星期三，五版。這是《鄭伯奇文集》的遺文，他有關俗文學的論述，一向無人談及。文章首先指出「文學，跟其他藝術一樣，應該是最大多數的民眾所能享受的。可是，目前電影、戲劇、音樂、繪畫等各種藝術多少都做到這樣地步了，只有文學，依然停留在少數知識分子的範圍以內。和最大多數的民眾依然不發生關係。為民眾的解放，為文學本身的發展，這都應該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當新文學運動的開頭，曾經有人說明，新文學就是『平民文學』，但是，事實上，新文學的作品並沒有普遍地散布到平民社會中間去。最近十年來新興文學運動，雖然以定向民眾相號召，但民眾不能接受這樣的文學，這也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五、六年前，曾經有過大眾化的要求，當然是根據這種事實而出發的。大眾化沒有什麼成績，原因自然很多，單就文學理論方面來看，也有許多地方值得重新討論」。作者隨後就文學本身進行論述，認為「其一，文學應該大眾化，尤其是中國現在的新文學更應該走向大眾化的這條大道。其二，大眾化應該由內容、形式兩方面著手，偏重任何方面都不能成功。站在這樣的觀點上，我們來建設新的通俗文

學」。「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文學是貴族文學。這在五四運動當時已經大家承認了。站在新的觀點上，還有許多可以補充的地方，我們如今且不去多說了。中國最初的市民文學，在當時，實在可以說是一種通俗文學，這卻值得一提。無論傳奇、評話、元曲、雜劇乃至《三言二拍》、《水滸傳》、《三國演義》等長短篇小說，實在都是當時的通俗文學。這和詩、頌、論、傳等廟堂文學或尺牘，小品等抒情文學相對比是更容易明白的。對於這種通俗文學，作者的態度有兩點可以看出，第一是教訓的；第二是遊戲的」。「如今時代不同了，我們所提倡的新的通俗文學，當然不能是用從前那樣的眼光去看，而作者的態度也應當是嚴肅的。我們以為新的通俗文學不僅是新文學的大眾化，而且是新文學目前應該走的一條大路。我們建設新的通俗文學，同時要因此使新文學的內容更加豐富，新文學的領域更加廣大。我們理解大眾生活，描寫大眾生活，更進一步，我們要以大眾的感覺為感覺，大眾的趣味為趣味。大眾的感覺和趣味，客觀的講都是健全的。說大眾的感覺遲鈍，那只是表示自己的感覺是病態的過敏。大眾的趣味並不一定是低級的，低級趣味只是作者曲意奉迎的一種醜態。當然，大眾的人生觀、道德觀是要具體地加以批判的」。「舊的形式是可以用的。我們相信最初的新文學都不免要利用舊的形式。不過在運用中，我們要使舊的形式漸漸脫棄了不適宜的成分而變成嶄新的東西。同時，我們明白西洋近百年來完成的文學形式不應該是我們絕對唯一的遺產。對於形式主義的歐化我們還要堅決的反對」。「這是我們提倡新的通俗文學的態度。至於目前提倡新的通俗文學，附帶地還有一種意義。這幾年來，小品文的盛行，心境小說的抬頭，末梢的都會趣味（當然具有殖民地寄生層的特色）的氾濫，都侵害新文學的正當的發展，以是大多數民眾為背景的新的通俗文學也是解除這種危害的一種有意義的方法」。

周作人 (1885-1967) :

〈關於《廣笑府》〉刊載於第一期，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星期五，五版。此文是周作人先生就趙景深先生〈《笑府》與《廣笑府》〉（《十日雜誌》）一文閱後的回覆。「景深先生：手書誦悉。尊文兩篇拜讀訖，關於《廣笑府》略有點意見。鄙意此書似非真本，如序即係雜湊《笑府》序即〈呵呵令〉而成，墨憨齋編《智囊補》另有一序，今何至於如此拆爛汗乎，前序因不宜重抄，〈呵呵令〉則是他人之作，簡直是抄襲了。又據尊文《廣笑府》有九卷後半均與苦雨齋選相同，此

亦是大笑事，蓋不忘當時係雜抄日本兩選本而以己意排列之，決不會無意中與《廣笑府》之次第完全暗合也。有此兩點，可知其為出於改編擬作，至於墨憨齋究竟有無《廣笑府》這一部書，則不佞未之聞，亦不能斷定其必無，但總之不是這一冊珍本耳。尊文中又疑笑話選中有若干則係風來山人所撰，鄙意以為此不可能，蓋原本是漢文，非外國人所能著筆，不但風來山人不能作，即別的漢學專家所作文章縱工，終有欠圓熟處，一見可知，若笑話這類東西更寫不好了。鄙見以為在日本有《笑府》原書存在，編者選抄若干，加以旁訓，事本易易，無須去另加改竄，故相信日本的兩種《笑府》選蓋皆從原書抄出者也。前年夏天往東京去，曾在內閣文庫一見《笑府》全本，唯時間匆促，只略一翻閱而已，將來如能找到此書，亟想另選一本，但不知此希望何時能達到也。匆匆奉覆，順頌大安。廿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作人啟」。文中提到的〈呵呵令〉見明李贄所輯《開卷一笑》，作者署名布袋和尚。苦雨齋選，指《苦茶庵笑話選》，一九三三年北新書局出版。

阿 英（錢杏邨，1900-1977）：

〈記嘉靖本《翡翠軒》及《梅杏爭春》〉（上、下）刊載於周刊第一、二期，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星期五；四月八日，星期三，五版。以原題名收入阿英《小說閒談四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中《小說閒談》，頁二十四至二十八。書後增加「按：此書已送鄭振鐸同志」。

〈跋「蹦蹦」、「落子」、「評戲」〉刊載於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三，六版。文章指出本期中署名「想阿寶的〈「蹦蹦」、「落子」、「評戲」〉，正是我所期待的一篇，想也是讀者們所共同期待的。有了這篇很實際的說明，我們對於蹦蹦戲可以獲得更充分的理解」。同時也就文章談了三點看法。其一「我們可以斷定蹦蹦戲起源於唐山，繁榮於關外，然後才到天津與北平，說明他們用的是唐山音而非關外音」。其二對想阿寶的文章認為蹦蹦戲「承上啟下的唱句，是從秧歌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或許不是直接以及間接受評書或評書的本子的影響呢？其三對蹦蹦戲中的「蹦蹦」二字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引證認為似乎應為「蹦蹦」二字。最後文章認為想阿寶的文章是這一階段研究蹦蹦戲最好的一篇。同時也指出蹦蹦戲的音樂，希望能看到沙梅先生的研究文章發表。其中關於戲班子的組織、演員的生活、劇團的經濟情形等，另有亦新先生的訪問記，合此數篇，關於「蹦蹦戲」的初步研究，有了相當的成果。

〈浙東訪小說記〉刊載於第四期，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五版。此文用原題名收入阿英《小說閒談四種》中《小說二談》，頁九十三至一〇一。本文刪去原文「又在這裏面找到一本舊版的『梆子腔』，大約刻於嘉道間，收《捉妖》（故事與《狐狸緣》小說同）、《打播》、《趕子》三全本。又《武松打店》一種，並非梆子。京戲考之最早的，我已得到《梨園集成》，秦腔本是從來未見，此是新的發現。但仍不免於有疑的，是察其內容，所用口語，都是南方的，不知何故。我很懷疑此人還有他書，但彼則堅稱沒有。後來與俠虎再去了一次，他已經走出了」接頁九十九，第九行後部分；增加「附餘姚盧氏藏小說目」部分。

〈蹦蹦戲研究的小結束〉刊載於第六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指出截至目前為止，在本報上所發表的關於蹦蹦戲的研究文章約有〈蹦蹦戲雜說〉（阿英）、〈「蹦蹦」、「落子」、「評戲」〉（想阿寶）、〈跋「蹦蹦」、「落子」、「評戲」〉（阿英）、〈蹦蹦戲目〉（趙景深）、〈關於蹦蹦戲〉（亦新）、〈我亦來談蹦蹦戲〉（魯男子）等，這些文章對於蹦蹦戲，大體上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較之李家瑞先生的〈蹦蹦戲考〉時代，研究上取得了若干成果。對於蹦蹦戲的起源、分布、組織、戲本、演技、音樂都一一有著論述。作者在總結此階段的研究，指出三點，其一「應該使我們特殊注意的，是蹦蹦戲如何在地域從奉天到北平，又如何的來到南方」。同時認為在蹦蹦戲的文字裏「都告訴我們，蹦蹦戲是被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火轟炸進關，它的南來，內含著一段極沉痛的民族傷心史」。其二，在此階段研究「所謂『還沒有得到最後的結論』的主要問題，是蹦蹦應該從『口』還是從『足』的問題。作者主張從『口』」並引證兩點說明。其三，具體分析了當時在上海白玉霜、張翠蘭、朱寶霞等演出蹦蹦戲的形式，逐一列舉出其特點。

〈「滿江紅」雜曲〉刊載於第七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三，五版。此文以題名收入阿英《小說二談》部分，頁一九七至一九九，見《小說閒談四種》。其中頁一九八第四行「這一類詞句……」一段，原文是「這一類調子，頗有些和彈詞的開篇相似。自然不免於粗俗之譏，但在細緻地、赤裸裸地寫就婦人的心理的一點上，確是相當不差的。所謂民間藝術，無論是彈詞、是小曲，其特長之點就在此，描寫非常地細膩。所謂『對口體』那是用問答的形式，如『對口滿江紅』這一首」。

〈再談清末時調〉刊載於第八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三，五版。本

文是作者繼發表了〈清末時調〉（以原題名收入阿英《小說二談》部分，頁一九二至一九六，見《小說閒談四種》）一文之後，再次根據當時看到的《最新醒世歌謠》（編者署名：痛國遺民，光緒三十年十月群藝書局初版，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增訂三版）中，收入的有關時調三十一種的內容，寫的即：愛同鄉歌、童子調、習業歌、愛國歌、送郎君、纏足歎、象山不纏足會歌、警世歌、戒煙五更調、時事曲、女子四勿歌、近體水調、農人悔賭、歎中華、老鴉歌、螞蟻歌、小五更、近體紫竹歌、老雄雞歌、小麻雀歌、十二月太平年、近體五更調、體操歌、從軍歌、練兵歌、勤學歌、近體四季相思、破國謠、寧波歌、國民歌、奉化不纏足會歌。文章認為此書「編輯的編選的態度是很不差的，所收各曲，沒有一篇不具有它的時代意義」。具體引「童子調」、「近體水調」、「近體四季相思」等內容，分析評價。文章最後感歎「我很希望能有機會發現那時真正的民間流行的歌曲」，而此冊「不免於出於純知識階級之手」。

〈《珍珠塔》版本彙目〉刊載於第十期，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星期三，五版。此文作為〈馬如飛的珍珠塔及其他〉一文的附錄一〈阿英藏珍珠塔版本目〉，收入阿英《小說二談》頁四十一至四十三，見《小說閒談四種》。比較原文增加「〈草本珍珠塔一卷〉」條目。

〈《近百年中國國防文學史》自序〉刊載於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五版。文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論述從道光十九年(1839)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近百年來主要發生的外強對中國的入侵事件。第二部分，論述「在這樣的形式之下，中國的作家們究竟幹了些什麼事呢？在作品上究竟怎樣的反映著呢？到現在似乎是一個『謎』。因為文學史家，一向只評文章的優劣，爭辯誰是正統誰是非正統，早都有『國家事，管他娘』的成見在胸，誰願意注意這些勞什子的『無當史眼』的『瑣事』」。誰又想到就在這『無當史眼』的勞什子的『瑣事』裏，存在著中華民族的『魂』呢」？對文學史家提出了值得深思的問題。第三部分，闡述「把這些抹煞的史實寫了出來，使大家看看我們作家已從犧牲的血跡，我開始寫這一部《近百年中國國防文學史》。……我希望從這一本書裏，不僅能藉以瞭解近百年來反對帝國主義文學的史跡，也可以從他們的經驗裏，學習往後的『國防文學』應當走怎樣的路」！最後說「我感謝友人鄭振鐸先生，他對這一部書的寫作，給了很大的幫忙」！此文《阿英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出版）未收入。

〈《自由結婚》——介紹一部反帝反漢奸的小說〉刊載於第十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六版。本文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北京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出版），頁八十九第六行至頁九十四第十四行，作為第八章〈種族革命運動〉的部分內容。比較原文補頁九十第十二行末「沒有一旦不亂。……」至頁九十一第九行結束部分；另外還補頁九十三第五行「我們順民還要頌揚功德，……」至第七行結束。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頁七十五著錄。

〈《活地獄》——一部暴露監獄黑暗的小說〉刊載於第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七月八日，星期三，五版。本文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頁一四一第十一行至頁一四六，作為第十一章〈官僚生活的暴露〉的部分內容。其中頁一四二第一行「以後就無下文。李伯元為什麼要寫作這部小說呢？……」至頁一四四第一行，為新增加的部分。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頁七十八著錄。

〈《痛史》——再介紹一部反漢奸的小說〉刊載於第十六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星期三，五版。本文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頁一五〇第五行至頁一五三第十六行，作為第十二章〈講史與公案〉的部分內容。其中頁一五二第四行補「所憾的，是他的認識太籠統，沒有把異族統治者與人民加以區別」一句；頁一五三第十五行補「吳趸人往後思想轉變，反對排滿，當然也是不完的一種主要因素」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頁九十五著錄。

〈《海天鴻雪記》——李伯元的一部吳語小說〉刊載於第十七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六版。本文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頁一六九第八行至頁一七二第十五行，作為第十三章〈晚清小說之末流〉的部分內容；將「不然，又安知其不能與韓子雲《海上花列傳》相掙」？一句補在頁一七二第十五行末。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頁八十八著錄。

〈《女舉人傳》〉刊載於第十八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五版。以原題名作為〈小說新談〉第五部分收入阿英《小說閒談四種》中《小說二談》，頁一五五至一五七。文章末尾刪去原文「再有一個特點，就是寫實的成分很重，而且並不誇張」。一句。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頁七十著錄。

〈晚清小說雜話〉刊載於第二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五版。文章分為五部分論述晚清小說。本文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中，作為第一章〈晚清小說的繁榮〉的內容，頁一至七。

〈《負曝閒談》〉刊載於第二十三期，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日，星期三，五版。本文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中，頁三十至三十三，作為第三章〈晚清社會概觀（下）〉的部分內容。其中將頁三十一第一行，原文「所以徐一士的斷論，終不免於是一種偏好罷了」。修改為「所以徐一士的斷論，是不可靠的」；頁三十三第六行開始，刪去「以這種方法，來暴露官僚，確是很有趣味的方法」一句。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頁八十三著錄。

〈《宦海升沉錄》〉刊載於第二十六期，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五版。本文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中頁一三五至一三八，作為第十一章〈官僚生活的暴露〉的部分內容。其中將頁一三六第七行原文「不過兩者都沒有《宦海升沉錄》寫的嚴肅，且能從本身重要事件上寫，顯得真實性更強」。修改為「不過兩者都沒有《宦海升沉錄》揭露的深透」。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頁八十五，著錄為《宦海升沉》。

〈小說作家考略一、天花藏主人〉刊載於第二十七期，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敘述偶然翻檢《顏氏家藏尺牘》，有周亮工子在浚尺牘兩通，皆有關小說，其一「小說書目適正馳上，使來籍奉」；其二有「《惡姻緣》小說前呈五冊，想以閱畢，幸付來價。因吳門近已梓完，來借一對，欲寄往耳」以及結合所藏康熙本《錯錯認》、《錦疑團》等資料，引文考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刊載於第二十九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三，五版。本文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中頁十六至二十，作為第一章〈晚清社會概觀（上）〉的部分內容。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頁六十五著錄。

〈關於秋瑾的戲曲補（上）〉刊載於第三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三，五版。查閱全部《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未見本文的（下）部分。本文作為〈關於秋瑾的戲曲〉一文中「第二篇」的部分內容，收入阿英《小說二談》，頁一八三至一八五。見阿英《小說閒談四種》。

〈關於小說《轟天雷》的主人公沈北山〉刊載於第三十三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三，五版。本文改題為〈小說人物考略〉一文中「一 沈北山 第一篇」部分，收入阿英《小說二談》，頁一〇五至一〇八。見阿英《小說閒談四種》。

〈《琵琶行》的戲文〉刊載於第三十五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五版。以原題名收入阿英《小說二談》，頁一八八至一九一。其中文章末尾頁

一九〇最後一行「所謂《琵琶行》戲文，至此結束」。之後刪去原文「原作傷感的氣氛，是反映的很弱。而且有因通俗化面更顯著力量的地方」一句。見阿英《小說閒談四種》。

〈《雅觀樓》〉刊載於第三十六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星期三，五版。以原題名作為〈小說新談〉第六部分，收入阿英所著《小說二談》，頁一五七至一六〇，見阿英《小說閒談四種》。其中頁一六〇末尾一句原文「一切淫穢事件，大都發生其中。主人公自樓成後，遂被稱為『雅觀樓』。此係書名來源，讀者所不可不知道也」。改為現在「一切事大都發生其中，故以此名書」。

〈小說作家與小說人物〉刊載於第三十八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三，五版。本文分為：一、羽衣女士；二、胡雪巖。以原題名〈羽衣女士〉作為〈小說人物考略〉第二部分，收入阿英《小說二談》，頁一一一至一一五，其中頁一一二第三行四個空格字為「愛敵如友」，見阿英《小說閒談四種》。二、胡雪巖，指出清末《胡雪巖外傳》很能說明一些史實。但近來翻檢《莊諧選錄》，又得到關於胡雪巖的記載不少，且多為「外傳」所不及。這些史實，足以補其「外傳」只言其盛，不言其衰的缺陷，不僅對於研究晚清小說有著意義，而對於研究晚清全國經濟，也很有現實的意義。遂移錄。

〈小說作家與小說人物（續）〉刊載於第三十九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五版。本文接上期，內容為：三、沈北山。本文改題名為〈小說人物考略〉中「一 沈北山 第二篇」部分，收入阿英所著《小說二談》，頁一〇八至一一〇，見阿英《小說閒談四種》。

〈一九三六年中國通俗文學的發展〉刊載於第四十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指出中國通俗文學得到新的開展，是「九一八」、「一二八」以後。由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日本侵占東北，炮轟上海，以及幾年間理論上的研究與探討的啟發，產生了許多新的通俗文學作家。最初開始通俗文學創作實踐的是瞿秋白，用「易陣風」筆名發表的有五更調的〈上海打仗景致〉，有小說〈英雄巧計獻上海〉，這是中國通俗文學走向新階段的第一聲。其次就是「中國新詩歌會」在一九三四年開展的活動，特地印行了《歌謠專號》等。還有就是新歌與音樂發生了連接。一九三六年的通俗文學最顯著的成績，是新彈詞的產生，如童鎮華的《國難記》、《走私》二書，對於其作品作者認為不足有三點，其一「是作者對於中國的政治，缺少本質的理解」。其二「韻腳運用的範圍太狹窄，重複處太

多」。其三「就是故事性還嫌不夠，彈唱時不足以養聽眾的要求」。另外還有〈陳桂榮〉、〈小烈士徐寶桂〉、〈慈谿寡婦〉三篇；趙之中的〈彈唱鼓詞賽金花〉以及有著特殊開展，影響廣泛的「歌曲」。通俗詩謠方面也有很多新成就，有陳子展、陶行知，新人有金性堯。陳子展的諷刺，最足以代表的有〈孔夫子選女婿〉、〈問孔〉、〈孔家店緊要聲明〉；陶行知的新作《知行詩歌集》，與他過去的作品一樣，「說理教育的成分較多，形式則近乎『歌』，文字通俗，是邁過同時的作家的」。作者認為陳子展的作品，「有時不免於感念，或者太激動了感情，這是對諷刺詩人不大相宜的」。「陶行知則太缺乏感情了，所以他的詩，稱之為『歌』較恰當」。「金性堯在通俗詩歌方面的成就，是偏於『謠』。他用歌謠的體裁，諷喻時政，批評社會，從事救亡活動，為大眾叫喊，處處洋溢著興奮了的青年的感情」。通俗的戲劇與小說就其在文學各部門的發展說，其數量上是最少的。理論研究方面「重要的有顧頡剛的《吳歌小史》，李家瑞的《說彈詞》，陳汝衡的《說書小史》，趙景深的《小說閒話》」等。關於蹦蹦戲研究的討論，參加人數達十餘人，其中洪深〈蹦蹦戲劇本《閻婆媳》序〉，尤其是巨制。理論方面的文章，「只有鄭振鐸的〈通俗文學的整理〉、鄭伯奇〈建設新的通俗文學〉、茅盾的〈關於民間文學〉、張庚的〈論鄉村的戲劇〉等數篇，反映了進步的傾向」。文章最後指出作者自己在一九三六年出版了《小說閒談》，完成了《晚清小說史》；發表了〈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玉堂春故事的演變〉等等文章，以及寫了近十萬字的研究雜考。此文《阿英全集》未收入。

寒 峰（阿 英）：

〈《欽命江南》〉刊載於第七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三，五版。本文署名寒峰，即阿英。以原題名作為〈小說新談〉一文中第三部分內容，收入阿英《小說二談》頁一五〇至一五七，見阿英《小說閒談四種》。

〈〈黃花崗紀事〉——介紹一篇廣東的「拍板歌」〉刊載於第十一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星期三，五版。以題名〈〈黃花崗紀事〉——廣東的「拍板歌」〉收入《小說二談》頁二〇〇至二〇二，其中頁二〇二最後一句未刪去原文「現在離黃花崗的時代，又過了三十年了，中國的時局並不比那時好，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發展的更到了極度。我很希望有心人，能多多的寫作一些國防的拍板歌，以激發兩廣民眾反帝反封建的熱情」！見阿英《小說閒談四種》。

遂 初（阿 英）：

〈《熱血痕》——一部種族革命運動的小說〉刊載於第十八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五版。此文署名遂初，即阿英。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中，頁一五九至一六四，作為第十二章〈講史與公案〉的部分內容。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頁一〇二著錄。

李 饒（阿 英）：

〈《警富新書》與《九命奇冤》〉刊載於第二十七期，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星期三，五版。此文署名李饒，即阿英。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中頁一五四至一五九，作為第十二章〈講史與公案〉的部分內容。其中頁一五五第五行刪去「胡適對於《九命奇冤》技術上的批評，是估計得很正確的」一句；頁一五九第十行為「《九命奇冤》的價值，有超過胡適所說之上的」，《九命奇冤》見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頁六十七著錄。

李 晦（阿 英）：

〈藏說偶記〉刊載於第二十八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三，五版。此文阿英以筆名李晦刊出。本文為評介《精禽填海記》一書內容，刪除原文章中有關原書的節錄部分，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中頁一六四至一六五，作為第十二章〈講史與公案〉的部分內容，《精禽填海記》見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頁一〇二著錄。

〈介紹一部關於婦女問題的小說——頤瑣的《黃繡球》〉刊載於第三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五版。文章略作次序上的調整，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中頁一〇五至一一〇，作為第九章〈婦女解放問題〉的部分內容。《黃繡球》見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頁九十三著錄。

〈藏說小話〉刊載於第三十一期，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五版。文章評介清末張春帆《宦海》，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中頁一三九至一四一，作為第十一章〈官僚生活的暴露〉的部分內容。《宦海》見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頁八十五著錄。

〈《梵天廬叢錄》中的賽金花——《孽海花》雜話之一〉刊載於第三十五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五版。以原題名作為〈《孽海花》雜話〉第四部分內容，收入阿英《小說二談》頁一二五至一二六，見阿英《小說閒談四種》。其中頁一二五第八行最後一句前刪去「寫得非常猥褻，大意是說她懂得『採補說』之類」；頁一二六第一句四個空格字為「人心已死」。《孽海花》見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頁一〇七著錄。

〈清末小說上的反康梁活動——小說雜話之一〉刊載於第三十六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星期三，五版。文章結尾處注明未完，但是查閱其後刊出各期，沒有續文。本文全部內容收入阿英《晚清小說史》頁八十一第六行至頁八十三第四行，作為第七章〈立憲運動兩面觀〉的部分內容。

〈小說瑣記〉刊載於第三十七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星期三，五版。內容分為：一、《稗乘談雋》中之賽金花；二、《紅樓夢》劄記二則。以題名〈《稗乘談雋》中之賽金花〉作為〈《孽海花》雜話〉第五部分，收入阿英《小說二談》頁一二六至一二七，見阿英《小說閒談四種》。《紅樓夢》劄記二則敘述翻檢到海昌周樂清（周文泉）筆記原稿一種，題為《壁談記》四卷，其中卷一有「紅樓夢」一條；另於葵愚道人《寄蝸殘贅》中亦有「紅樓夢」筆記一則。

〈《莊諧叢錄》中之小說資料〉刊載於第四十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指出《莊諧叢錄》二卷，醒醉生編，刊於清末，蒐集當時的史料很多。有關小說的亦不少，屬西洋的有《求實報》刊載的〈真本茶花女〉；中國部分，有胡林翼的〈紅樓夢論〉，有暴露癸酉科場案的〈黃梁夢〉，談到《野叟曝言》所錄傳說，尤為突出，並引文加以說明，還有論及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及《古今奇觀》、《官場現行記》方面的資料，戲劇的材料也不少，最重要的為〈新安驛〉一則。最後說明《莊諧叢錄》有兩種版本，後者較好，有不少增補。

德 均（阿 英）：

〈評《中國小說史料》（孔另境編）〉（未完）刊載於第三十三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三，五版，本文署名德均。然而在〈評《中國小說史料》（續）〉（《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第三十七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星期三，五版），署名阿英。此二文著者如何確定，尚無把握，暫擬定著者為阿英。文章指出從事輯錄文獻中的小說史資料，要以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小說考證續編》、《小說考證拾遺》為最早。而魯迅的《小說舊聞鈔》卻和蔣氏諸書不

同，不僅體例謹嚴，而取材也頗翔實可靠，所有資料注明卷帙，但可惜的是所收項目不多。然而孔另境編《中國小說史料》則是《小說舊聞鈔》的擴大改訂而成，同時將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小說考證續編》、《小說考證拾遺》和《小說枝談》四書中的資料似乎全部收入，即彙集五種書的資料，也有新的資料加入，其體例大體保留《小說舊聞鈔》的形式。文章列舉新的資料散見各項，一、舊有資料新增資料者。二、新增項目。引用資料的編輯、節錄、取捨與其他五種書的比較，以及不足部分。同時認為《中國小說史料》一書有擴大的必要，除了補充雜記、筆記的資料外，還要注重以下幾項：一、各地方志的輯錄；二、輯錄原書序跋中有關史料，細心的校訂，忠實的輯錄更是編輯時不可缺少的要件。文章篇幅較長，僅略述。

吳 均（阿 英）：

〈《法國女英雄彈詞》〉刊載於第二十九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三，五版。此文署名吳均，即阿英。以原題名作為〈小說新談〉第十一部分，收入阿英《小說二談》，頁一七三至一七五，見阿英《小說閒談四種》。其中頁一七五末尾段落原文為「《法國女英雄彈詞》在意義上雖有可稱，在寫作技術上，卻也有許多的缺點。這是一部小型的彈詞，不過萬餘言的光景。在這樣的數量之內，想說明羅蘭夫人的一生，及當時的革命史實，除掉簡略的敘述，本已沒有其他的方法。因此，在這裏面，所能看到的，也只有史實的簡述，而難見描寫。比如羅蘭夫人就義一節，應該是多麼的動人，在女英雄彈詞裏，竟是這樣的簡單，其他已可見。彈詞是以描寫細膩見長的，此書卻沒有做到。關於法國革命的成因，及後來幾回轉變的理由，也說得不夠，因此，對當時的幾個黨派，讀者從這裏面，也不能有清切的認識。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階級，無疑羅蘭當然是一個英雄，自不能希望四十年前的作者，對她有更進一步的理解，不過在《法國女英雄彈詞》裏，就嫌把這個人物寫得過於『英雄』一點。這就從寫她成為羅蘭事業的支持者一點上，也可以看得出來。然，這書雖然寫得不免粗糙，我們卻不能因此否認它在當時所激起的影響，對於婦女解放運動所給予的力量……」。

且 同（金祖同，1914-1955）：

〈《磨難曲》〉刊載於第六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指

出最近看到了日本文求堂排印了它的稿本《磨難曲》，雖然是俚曲，寫得卻非常動人。作者認為雖然內容寫的時代是宋朝末年，「卻完全影射著崇禎亡國的失策，當時朝野的昏庸頹廢，中間還插上任大王這一類梁山人物」。同時指出「這部書最好的部分，是寫民眾的受難。他將難民初次乞食的尷尬情形，非常真切地描寫了出來，使人達到了含淚微笑的境地。其次，就是因為俗曲的關係，裏面保存著按韻腳的俗字很多，……但讀了不但不覺得詰屈蹇牙，還增加了音節的活潑和趣味」。文章結尾論述此《磨難曲》裏「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對明室的遺憾，……在實質上也可以說是一部明末清初的社會史」。《磨難曲》為清蒲松齡著十四種俚曲之一種，一九三六年經路大荒先生校注題作《聊齋志異外書磨難曲》於日本東京文求堂出版。

〈杜十娘沉箱以後〉刊載於第十期，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指出杜十娘的故事在《警世通言》卷三十二中，取材於明萬曆二十年事，最後以悲劇結束。《今古奇觀》選入時，稍有刪節，但還是不能滿足一般小市民的要求，覺得沒有大團圓，總歸是掃興的事，於是聰明的文人，看到了這一缺陷，便加上團圓的尾巴。遂將看到的一本《百寶箱》傳奇、一本鼓詞、一本蹦蹦戲的內容情節敘述比較，言其情節合理部分與離奇的地方。

〈再記杜十娘沉箱以後〉刊載於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接續前文，將得到的一本廣東木魚書杜十娘敘述，全書共分三卷，上卷把李甲逛院，十娘從良，很簡潔地寫出；中下二卷完全寫十娘沉箱。本書描寫得非常細膩、誇張，很能抓住市民階層的心理。金祖同早期發表的俗文學研究文獻罕見，故多為研究者所忽略。

趙景深(1902-1985)：

〈所謂徐文長的《諧史》〉刊載於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四月八日，星期三，五版。文章引文論證從阿英處借的一本《刻徐文長先生秘集》，是坊間偽托徐文長的。

〈蹦蹦戲目(上)〉刊載於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三，六版；〈蹦蹦戲目(下)〉刊載於第六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星期三，五版；〈蹦蹦戲目補〉刊載於第八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三，五版。今以題名〈蹦蹦戲目〉收入趙景深著《中國戲曲叢談》(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六年出版)，頁三〇〇至三〇五。

〈外國人看中國戲〉刊載於第七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收入趙景深《中國戲曲初考》（鄭州中州書畫社一九八三年出版），頁二八九至二九一。

〈《施公案》考證〉刊載於第二十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三，五版。文章以原題名收入趙景深著《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〇年出版），頁五一二至五二二。

〈《海上花列傳》〉刊載於第二十一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三，五版。改題名為〈讀《海上花列傳》〉收入趙景深著《中國小說叢考》，頁四六七至四七〇。

〈關於《西湖二集》〉載於第三十一期，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五版。以原題名收入趙景深著《中國小說叢考》頁三九二至三九七。

〈從大鼓到蹦蹦——《槍斃小老媽》的形成〉刊載於第三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三，五版。以原題名收入趙景深《曲藝叢談》（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頁二〇五至二〇七。

〈北平的喜歌〉刊載於第三十四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三，五版。文章論述《歌謠》第二卷第十七期徐芳的〈北京的喜歌〉一文，是作者親自從乞丐那裏採集得來的，分為：賀娶親歌、賀嫁女歌、賀生子歌、賀新年歌、賀建屋歌、賀開張歌等六種，幾乎沒有傳本，所以很值得珍視。然而，本文作者所看到的刊本喜歌有學古堂本《後娘打孩子》和《小兒難孔子》，後面所附的「唸喜歌」，兩本相同。只是《小兒難孔子》多了一篇〈八洞神仙賀壽〉，是否為喜歌，值得疑問。另外相同的八篇逐一與徐芳敘錄的喜歌比較異同。

〈北平的兒歌〉刊載於第三十九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五版。文章通過《數唱》中的「北平歌謠」（歌林唱片公司灌有何鑒如和廣少如合唱的兩張），將其中保留了不少北平兒歌的，與朱雨尊所編《民間歌謠全集》（世界書局版）中的北平歌謠部分，逐一略錄出八首不同的比較。另將《數唱》中還有十三首，而《民間歌謠全集》中所不曾有的列舉下來。從中看出「編輯《數唱》的人無意間竟作了一個歌謠的蒐集者，替我們保存了不少的材料」。同時指出「因為這是連唱的，分列為二十一支歌，我個人按照文氣揣測的，其中當有分合不當之處」。

鄒嘯（趙景深）：

〈《中國小說史料》（孔另境編）〉刊載於第三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三，五版。本文部分內容以題名〈《中國小說史料》跋〉，收入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頁五四四至五四五。

想阿寶（原姓名不詳）：

〈「蹦蹦」、「落子」、「評戲」〉刊載於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三，六版。文章指出阿英先生〈蹦蹦戲雜說〉一文對蹦蹦戲的評價很正確，正如文章中所說「它的存在有它的強固的社會根據」。同時根據實際調查進一步闡述了蹦蹦戲、落子、評戲的源起，相互間的關係。蹦蹦戲是如何發生，如何變化，如何分布，如何改革以及關於它本身的許多問題，能使我們對蹦蹦戲有著親切的認識。

劉聿功（生平不詳）：

〈彈詞雜論〉刊載於第五期，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六版。文章從聽彈詞的民眾，彈詞的內容，彈詞故事的作者，以及彈詞本子到「彈詞家」口裏說出是經過一番改革了等等方面，論述了彈詞當時在上海流行的情況。同時指出彈詞與評劇不同，就在彈詞比較評劇增加了唱的部分。比較了彈詞目前的唱法中馬調和俞調的不同。文章最後論述到彈詞是通俗藝術，之所以受到民眾的喜歡，主要原因是彈詞家們所創作的故事，刻畫的人物，比較接近於所謂的「下等人」的描寫，接近於「下等人」，理解「下等人」，表現的較為真實。假若彈詞家得彈詞，不瞭解這一實際，就不會成功。「先要他們理解了新的彈詞的主意，還要他們理解人物的真正的善惡，才能恰如有志之士的作意。不然，反作用是不堪設想的」。

陳志良（生平不詳）：

〈中印寓言的影響〉刊載於第五期，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六版。文章論述信佛教的上海人，在人死之後，必請道士來做三天功德，叫做「做功德」。功德做完的時候，最後一天的晚上，道士們必唱「灘簧」（蘇簧）以娛賓客，其中有首灘簧，名叫「嚴嵩慶壽」的，敘述兩個喝醉了酒的乞丐對話，說的是

一段寓言，此寓言諷刺得非常好。擬定為「叫化坯」，其內容與印度寓言「鼠原是鼠」是同一個類型的；並且與後來看到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頁四〇三）引有劉元卿作的《應諧錄·虎貓》一則，三者幾乎又是一模一樣。劉元卿此人約是明朝人，因此可以知道這個典型的寓言，在明朝就已經流傳了，而且有了紀錄。引三則寓言，略作比較，得出三點結論。其一，流傳於中國民間的「叫化坯」式類型的寓言，是有其古本根據的，與《應諧錄》上〈虎貓〉，骨幹是一致的，但是加上了許多衍生，所以有了類似的故事出現了。其二，中國的〈虎貓〉與「叫化坯」式的寓言，是受印度寓言「鼠原是鼠」而產生的，列舉原因三則，首先「印度寓言在六朝時候已經傳入中國，當時在中國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依『鼠原是鼠』式的典型而作〈虎貓〉，受到影響極為可能。其次依故事流傳的公式，愈後愈大，愈早愈小的公例，三個寓言的人物比較，……可見『叫化坯』是〈虎貓〉的放大，〈虎貓〉又是印度的『鼠原是鼠』的放大。再其次中國的故事傳述者，如灘簧、說書、宣卷等等，正和印度的『說話人』傳述故事於民間一樣。印度的寓言以及小說戲曲等等，產生的時代較我們早得多，而中印交通又甚密切，所以由印度寓言之輸進而為我們模擬，毫不足異」。

〈江蘇民間故事〉刊載於第十一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星期三，五版。文章分為兩部分：一、唱歌之杯——松江民間故事之一。故事講述的是從前松江有個少年農夫唱得一口好歌（應為民歌），博得了許多人的讚美，只是可惜他是個癩癩頭（禿瘡）。一位千金小姐被他清脆悅耳的歌聲吸引了、感動了、陶醉了，打動了心弦，產生了迷戀。於是大著膽子，差了丫鬟招那位少年來一見或許想要面託終身。唱歌少年應了丫鬟，前去相見，起初小姐以為這位歌人的相貌，一定與他的歌聲同樣的優美，結果卻很失望。然而少年見過了小姐一面之後，他的魂好像被小姐勾了去似的，田也不種了，飯也不想，終日在小姐樓堂下，竭力地唱歌。他的聲音，由慷慨而激昂，由激昂而希望，由希望而悲哀，終於力竭聲嘶，病倒了。在其病很重的時候，對其母親說明了致病的原因，希望在其死後，將其家傳玉杯送到小姐那裏，他將靈魂化在玉杯裏去見她。小姐聽到這是少年歌人死後靈魂化托之杯，心裏產生了極大的悲痛。她在杯中斟滿了一杯酒，只聽得少年歌人平時所唱的歌兒，漸漸地由杯中發出。她聽了眼淚止不住得流下來，當兩滴淚珠落入杯中，那酒杯爆碎了，歌聲也寂然了。二、沉東京——崇明的民間故事，故事說的是崇明島升起，原故是東京城沉下的傳說。從前東京城裏有個孝子，他只有一位老母，有一

天夜裏夢見一個人，對他說「如果城隍廟前的石獅子眼睛出了血，這座城馬上要沉到水裏去了」。那孝子相信了夢中之言，天天早晨都到城隍廟前去看石獅子。時間長了，有個好奇的屠夫問他原因，孝子就把夢中之事說了一遍。那屠夫以為他瘋了，石獅子的眼睛裏哪能出血呢？於是想哄他一下，次日清早屠夫把豬血先塗在獅子的眼睛上，那孝子看到後，趕緊回家背了老母親就逃。他走前一步，陸地就馬上沉下，終於那座東京城全部沉到水裏去了。文章指出「這個故事，很普遍地流傳在民間，尤其是操船上生涯的人都能知道……東京城的地址，在金山嘴之東，奉賢縣之外的海中」。

〈江蘇的民間故事〉刊載於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五版。文章分為兩部分，一、南京城的故事——流傳於南京。講述明太祖平天下，問軍師劉伯溫：「皇城應當造在那裏？」劉伯溫回答：「看天意而定吧！萬歲可用一支箭，向天射去，箭落在那裏，城就造在那裏。」但是要建造都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有三個山頭，一條燕雀湖阻礙著，於是劉伯溫就把它該平的平、該填的填了，所以南京有句「平三山，填燕雀」的俗語。明故宮一帶從前也是燕雀湖原址。南門附近也是燕雀湖填起來的，當時城牆築起的時候，總是倒塌，明太祖聽了劉伯溫的建議，向沈萬三借了聚寶盆鎮壓在南門，城牆方才堅固（也有明太祖與沈萬三的故事）。因此南門也叫「聚寶門」。二、八仙與掃地老頭——松江民間傳說之一。

〈秦始皇趕山頭——江蘇民間故事流傳於青浦〉刊載於第十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星期三，五版。文章講述秦始皇到江南，見到江南良好的農田上，被一座山頭占住了，既妨礙農事，又妨礙交通，於是他決心要把這些山頭趕到東海大洋裏去。他趕山是用一隻鞭子，可是一座山被趕走了，地面上卻留下了一個個水塘，所以在昆山、青浦、蘇州一帶，現在有很大的水塘和湖，據說都是被秦始皇將山頭趕走後的遺跡。秦始皇趕山頭的時候，覺得累了，就在最後一個小山上打瞌睡，不料他在打瞌睡的時候，他趕山頭的鞭子，卻被仙人偷了去。於是所趕的九個山頭就停留在松江附近，就是天馬山、辰山、薛山、鳳凰山、北簕山等九峰，所謂「三湖九峰」的九峰。秦始皇打瞌睡的山就是「北簕山」，所蹬的一腳，腳印跡還留在山上，山石上還留有被他趕山時鞭打的鞭跡呢！

〈江蘇的民間故事——上海的自然神話〉刊載於第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七月八日，星期三，五版。文章分為七個小題目來敘述流傳在上海的自然神話。一、日和

月，講述太陽和月亮是夫妻的傳說。二、粉和雪，講述從前天氣非常寒冷，人們沒有得吃的時候，天上就落下雪白的麵粉，人們可以食之，不致餓死。後來，因為大家爭奪麵粉的時候，相互打架以至於把人打死，悲劇發生，所以老天到天冷的時候，就落下雪而不是可吃的粉了。三、黃浦江的淡水，講述黃浦江裏的水，原來是鹹的。是一個名叫海瑞的人，在奸賊嚴嵩慶壽，各州各縣送大批銀錢禮物經過黃浦江運進京城時，截獲下來，拋入海中，向海龍王買取得淡水，所以上海人現在有淡水喝。四、龍華十八灣，講述從前龍華有個女子，懷孕足月而生，生下條龍。龍出生後向東游往大海，游過的地方馬上變成條河，但它對母親是戀戀不捨，每游過一段，回頭望一望，一共望了十八次，成了河的十八灣，所以上海俗話有「龍華十八灣，灣灣望娘頭」，就是指龍華港裏十八個灣而言。五、人的尾巴，講述從前人類是有尾巴的，如果人將要死的時候，先是尾巴的第三節焦黃，人們發現自己的尾巴焦了，知道自己死期已到，就消極等待死亡。觀音娘娘見到人們為死發愁，就做了法事，將人們的尾巴斬掉了，所以我們現在大家沒有了討厭的尾巴了。但是還有斬掉的痕跡。六、地動，講述人類所居住的地方，是鼈魚頭上所頂的一塊泥。信仰佛教的人，不停地敲著木魚，就是在鼈魚頭上，這樣鼈魚就安然不動。如果木魚聲一斷，鼈魚就要發癢而動，因此人類居住的地方就要發生地動了（地震）。七、泥造的人，講述從前起始人用泥巴捏成了一百個男人，一百個女子。捏成了之後，曬在太陽下面，正在曬乾的時候，突然天上電閃雷鳴，快要下大雨了。起始人趕緊將泥人往屋裏搬，還沒有搬完的時候，大雨已經落下，他看到來不及了，急忙用拉柴的耙犁往屋裏拉。這樣起始人所造的泥人，就成了真人，有強壯的人，同時也有折斷腳、爛掉腿、瞎眼等等各色殘廢人，這都是起始人用拉柴耙，拉進去的時候碰傷的。起始人本來造就了一百男，一百女，男女相配，結為夫妻，不料下雨搬進去的時候，缺少了一個女的，所以現在世界上常常多一個男的而少一個女的，因此有不正當的結合。這是起始人允許的「捉落空」，上海俗語叫做「扎姘頭」。

〈江蘇的民間故事〉刊載於第十九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所講述的故事是「多情的黑猩猩——流傳於無錫」，內容為民間傳說「一朝三閻老，並無好種草」，申元幸的母親是尼姑（即：《玉蜻蜓》中申貴生的情人三師太子貞），顧大麻（鼎臣）的母親是丫鬟，王敖的母親是猩猩。本文所說的就是王敖母親的傳說故事。故事大意是，據說明朝無錫有位王某，決定乘船出海探寶，其子決議隨同，無奈王某帶著兒子，一同踏上探險之路。他們的船在海上航行了數

天，其子得病，越來越重，終於不救而死。王某將其屍體放在一個荒島上，以便探險回來時帶回老家。此荒島四面環海，島上無人，只有一個母性的大猩猩，占領著荒島。猩猩發現了屍體，感到好玩，就把他抱到了居住的山洞裏。然而王某的兒子並沒有死去，只是由於水土不適，脫離底氣的原故，所以在山洞裏很快甦醒過來了。這樣王兒就在荒島上面，同猩猩相伴，並生了半人半猿的一男一女的孩子。數年以後，王父探險回來，路過荒島，見到了兒子，詳知了所發生的事情。隔了一日，趁著猩猩抱著幼女出去找食物的機會，王某偕同兒子和幼子，搬著居住洞中一塊很明亮的寶物，乘船離島，等到猩猩發現的時候，已經走出很遠了，猩猩吼叫著將其幼女撕死，接著跳入海中而亡，王兒目睹一切。船回到家鄉無錫，剛剛靠岸，從船的下面漂出一個毛絨絨的怪物，這就是多情的猩猩。它雖然在海裏死了，但還是附在船底回到了家鄉。王兒把它好好地葬在無錫石塘灣，俗名野人墳。王兒終身不娶，一心教養其子——王敖。王敖後來中狀元，拜宰相，封閣老，榮宗耀祖。

〈江蘇的民間傳說——顧爛頭流傳於上海〉刊載於第二十三期，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敘述顧爛頭傳說是上海浦東塘橋鎮人，不知道是那個時代的人，家境貧寒。此人不務正業，閒來無事，到江西龍虎山上的妹夫張天師那裏學道術，因為偷懶，只得到張天師召給的三員天將，並交他符籙訣竅，道家的本領。在回來的路上，隨意口唸咒畫符，面前出現一位金甲天神「請問天師有何吩咐」？顧爛頭嚇昏了，脫口而出「給我拿草紙來」，天將一聽大怒，順手賞了一記耳光，從此終年潰爛，醫治不好，所以大家叫他顧爛頭，從而失去真名。作者同時指出，從小就聽到這個故事了，數年來沒有找到出處，今讀到乾隆《寶山縣志》（卷七），才知道這傳說的源流，引《寶山縣志》原文說明。最後指出「《寶山縣志》與民間的口頭傳說，雖微有不同，但我以為它的本身是相同的；兩種傳說的相異，即可證明《乾隆志》所取得，亦是民間傳說」。

〈孟姜女傳說的種種〉刊載於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五版。文章認為孟姜女傳說的研究，因材料各異，推論則不同。對於這項傳說，寶卷唱本以及民間流傳的，尚未為人們知曉的還很多。文章以三種寶卷，一種唱本，以及松滬一帶的民間傳說加以論述。首先指出「坊間刊行的《孟姜女寶卷》能蒐集得到的有二種，卷裏表現的情節，大體相彷彿」。內容為：「秦始皇無道，起造萬里長城。天宮裏一位芒童仙官見下界穢氣沖天，欲去解救萬民之難，仙姬宮的第七位仙姑勸他莫管閒事，他不聽，逕自下凡，投生到蘇州，名叫萬喜良。仙姑

不忍坐視，亦下凡遁入大冬瓜中，為孟、姜二姓爭奪而起訴訟，縣官判為兼祧二姓，因名孟姜仙。玉帝知道了芒童仙官私自下凡，大怒，命太白金星到人間散布謠言道：『蘇州有個萬喜良，一人能抵萬民亡，後封長城做大王，萬里長城永堅剛。』秦始皇聽到童謠，就差人捉拿萬喜良。喜良只得出門逃難，逃到孟家花園裏，恰遇孟姜女遊園跌入水中，喜良把她救起。孟員外將她配與喜良，正在結婚之際，喜良被捕，活埋長城之下，代替萬民之死，始皇封他為長城萬里侯。孟姜女夢見喜良說他已死，乃做了寒衣，送往長城。到了長城，放聲大哭，哭倒長城，露出喜良屍骨。始皇見她美貌，欲收入宮中，孟姜女提出三個條件，一、為喜良造大丘墳，二、造萬王廟，三、御駕親祭王墳。始皇一一答應實行，到了墳廟俱成，始皇御祭時，她卻跳入焚化紙定的火中而死。芒童、仙姑俱得玉帝之寬恕而復原位，並度兩家父母為仙。這種寶卷裏所敘的情節，可以稱為流行在江南的民間傳說的代表。』

敘述另一種抄本，《孟姜烈女寶卷》，是上海「宣卷者」所用的底本，內容、情節和輪廓與上面所舉的相同，所不同者為「萬喜良作范禮良，是湖州武林縣人，取妻齊氏，已生一子。另有湖州進凌縣白塔村有許、孟、姜三姓，都是富室，許、孟聯婚，生下一女，過房與姜姓，故名許孟姜，即孟姜女。那時，秦始皇命蒙古北築長城，欲凍死北番，又假借考賢良，使天下書生，都去趕考，以便盡行消滅他們。范禮良亦是去應考而被迫造長城，吃不起苦而逃，逃到進凌白塔村，躲在樹上暫避，適孟姜女捉螞蚱之後，覺得悶熱，解衣入池洗澡，見了禮良，大驚，應誓言能見其肉體者，即配為妻。於是禮良入贅許家，與她成親，結婚三日，備極恩愛。不料始皇行令天下，要捉築城逃犯，禮良畏罪，別了姜女，前去自首，被築城監管活埋在長城之下。姜女夢見禮良行色不佳，又做下寒衣自送去，路上吃盡大苦，姜女到了長城，找尋不著，方知已死，葬在北門，姜女連哭三日三夜，城崩一十三丈，露出屍骨，血滴尋到禮良之骸骨。秦始皇欲取孟姜女，被提的三個條件：一、封許、孟、姜三姓及范禮良之子；二、要一千僧道，拜四十九日梁皇懺，超渡禮良；三、要搭起百丈高橋，送禮良之魂上天。始皇完全實行了，姜女乃抱禮良之骸骨跳入河中而死。蒙古追封三姓官爵時，被天雷打死，始皇江山，因此不得長久。禮良與姜女，原來是玉帝左右的金童玉女，思動凡塵，造下一段孽緣，後來乃歸天庭」。

接著敘述唱本《孟姜女萬里尋夫》，一名《重編官話孟姜女尋夫哭倒萬里長城

貞節全傳》。書中情節是：「秦始皇興工造長城，蘇州府掛榜捉喜良，孟姜女脫衣撈扇，萬喜良逃難入園，訂終身正逢花燭，遇欽差捉去造城，送寒衣拋別父母，尋夫骨哭倒長城，見美色昏君親祭墳，全貞節孟姜女投河。」此本與前面寶卷不同的情節，「一是孟姜女撈扇而被萬喜良看見肉體；二是喜良在結婚時被捕；三是孟姜女親送寒衣之前，孟興去送，但是孟興在蘇州嫖院而未贈送去；四是孟姜女盡節而死，始皇聽了太后之意，合葬喜良夫婦在一起，封她為天仙女，立貞節祠，春秋享祭」。此種唱本，「完全用七字句編成（兼有一段九字句），為淮陽一帶的大眾讀物。其中又有一段（哭七七）。又有一段孟姜女過澹野關時所唱的『十二月花名』，與普通所見的『唱春調十二月花名』不同」。

關於孟姜女出世，作者「據松江的民間傳說，以為松江府華亭縣，有孟、姜二姓為貼鄰，都是大富之家，但各無兒女。忽有孟家的一枝瓜藤，伸入姜家後花園中，結了一個大瓜。有一天，姜太太聽得瓜中有小孩哭聲，剖而視之，乃得一女，愛如珍寶。孟家知道了，前來爭奪，姜家不肯，同到官庭告狀，縣官斷為兼祧二姓香火煙，因名女為孟姜女云」。據「上海的傳說，以為孟姜女千里寒衣時所經過的地方，不生蚊蟲；上海城內裏□瓜街向來沒有蚊蟲的緣故，就是孟姜女經過的關係」。「上海又傳說，『麵腸魚』是孟姜女的肉變成的，據說秦始皇依了孟姜女的三個條件之後，孟姜女就跳入河中而死。始皇大怒，將她屍首撈起。把肉體一絲一絲地用刀割下，後來變成了『麵腸魚』。所以吃素老太婆見了『麵腸魚』都說『阿彌陀佛，孟姜女變成格，罪過罪過』」。還有「在民初上海拆廟時，拆出一個石俑，背有『范杞良』三字，想係工匠們鬧的玩意，以為范喜良『一人能托萬人』，而造這石像作為鎮壓之物」。「又據川沙一帶的傳說，在護塘（即護海之堤）兩旁，河裏濱裏的水都是鹹的，惟有幾個水塘裏的水是淡的，可以飲用；因為這些淡水塘，從前曾經為孟姜女在裏面汲過水的緣故」。

陳志良在此將三種寶卷、二種唱本傳說中孟姜女的故事，加以比較，探尋其相互影響，這在當年文藝研究方法上很值得重視。同時，這一研究成果，也彌補了當年孟姜女傳說研究之不足，尤其是首先將寶卷文學作品納入相關傳說的發展過程中進行研究探討，既開拓了這些傳說故事研究的內容，又推進了寶卷文學專題的研究的深度，這對於俗文學研究工作深度和廣度開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宣卷」——上海民間文藝漫談之一〉刊載於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五版。文章首先指出：「『宣卷』古稱『佛曲』，鄭振鐸先

生：『佛曲為流行於南方的最古老的民間敘事詩之一種；彈詞及鼓詞等，俱從此演變而成；其歷史至少有一千餘年。此種有很大影響與平民間之文學，向未有什麼人注意過。』（〈佛曲敘錄〉小引）彈詞與鼓詞，是否從佛曲演變而來，現在，尚未研究清楚而得到明證以前，可置不論。但是敦煌石室所發現的作品中，已有『八相成道經俗文』等幾種佛曲，可見其來源的確古遠了。」接著敘述「流傳於江南的宣卷，在『吳語』區域裏，都有它的勢力，尤其以蘇州上海兩地為甚」。唸宣卷人可分為三種：「一種為個人的，手敲木魚，口唸宣卷，沿街行乞，機會好時，有人請去宣卷一次，得到一二毛報酬，算是大幸了。還有一種專唸宣卷的，有人請去宣卷一次，酬報幾元，例有一定」。「另一種是以唸經祈禳宣卷，祈禳為正業，唸宣卷為副業，專以娛人，這類人，上海的浦東最多」。

唸宣卷形式「以一人為『主唸』，另有三個人從旁相和，為之『和卷』，旁邊安放一個木魚，擊之以合節拍。宣時有『唸』又『白』，說『白』是則將卷中情節，曲為解釋，『唸』時則主唸者唸一句，合卷者合一句，二句時合卷者同唸一聲『阿彌陀佛』。」如：「主唸者：『翡翠娘娘開口說』——和卷者：『南無』；主唸者：『夫君在上聽遠因』——和卷者：『阿彌陀佛』——《翡翠寶卷》。」「此種『唸』的句子，有三字一句，五字一句，然最普通而最多者，則為七字一句，而此種唸的句子，在《妙英寶卷》（一名《妙英白衣大士寶卷》）裏，卻作『偈』，這顯然是與佛教有關的證據了。」唸宣卷的時間，「大多數在晚上舉行，因為晚上人靜，容易發揮卷中精義，而且感人也比白天為親切」。唸宣卷的場所，「大多數又在庵廟中，或住家的神佛之前舉行；或者在娛神的集會時舉行」。由此「宣卷之古稱『佛曲』，以及與神佛有關係者，原因在此」。唸宣卷方式「無所謂唱腔調，除了一個木魚以制節拍而外，間有用胡琴、笙蕭、弦子之類，但是究竟屬少數，即如有若無。但在卷中遇到某一段非常悲慘的情節時，往往夾了一節『哭五更』。『哭五更』既有腔調，但甚簡單，間用鐘鼓之屬。以助親切」。

對於「哭五更」的詞句，文章舉例如：「一更裏，月色明，誰曉監中受極刑？痛傷心。牢頭獄卒賺金銀，此時無錢用，刑法不放輕，肚又飢來身又冷，聲聲叫苦情，我的天下——及早回頭做善人。南無佛；南無阿彌陀佛。恨殺媒人劉氏女，又恨自身迷戀心，要想妙英成親事，誰知搶了禍臨門——《妙英寶卷》。」文章認為研究宣卷的價值，「不在於它的曲調，唱法，人數等等，實在的價值，在於寶卷本身所含的內容，比任何民間文學來的豐富，美麗；每一本寶卷，好比一篇史詩，敘

事詩；其中情節，有複雜的，也有簡單的，故事的來源，或採取自稗官小說，或根據民間傳說，或宣揚佛教。宣卷的作者，大多數是無名的，所以有的宣卷寫得極好，如《太華山紫金鎮兩世修行劉香寶卷》即《劉香女寶卷》，寫得複雜、哀豔、曲折，宣唸的時候，須時一日或二日才能完畢」。由於宣卷的作者，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文化程度不高，因此所寫的作品，大都描寫缺少常識，錯字滿篇，這是作者據所見的許多抄本宣卷而言。如「所見得抄本《翠蓮寶卷》（此卷係採取《西遊記》中劉全入冥府進瓜一段）而論，竟說唐僧（即玄奘）往西天取經，路過淮安府，向劉全之妻翠蓮娘娘化得金釧一枚的故事，玄奘取經，根本上未曾到過淮安，可見宣卷的作者之常識的缺乏了」。文章最後論述了「宣卷的中心思想，只有『勸人為善』四字，描寫情愛之處很少見。其敘述的過程，不外乎某一個人，中間經過種種困難，苦處，後來方得美滿的結果，最後他或她看破紅塵，吃齋念佛，修成正果」。但是惟《延壽寶卷》例外，「此卷在人家慶壽時必定宣唸，也是一本勸世文」。關於宣卷的收藏和研究，作者所知，「只有鄭振鐸先生一人，他曾經寫了一篇〈佛曲敘錄〉」「但在坊間能夠收集到的宣卷，當然不止此數」。文章認為「更有價值，還是『唸宣卷的』所有抄本」。同時還指出，在當時「宣卷在民間的勢力，不亞於『申曲』，但是在廣播電臺上的力量則『宣卷』不及『申曲』」。「曾經廣播宣卷的是位徐秋濤，因何關係尚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深為可惜」。

陳志良先生從實際田野調查中，鉤勒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有關流傳在上海附近地區民間宣卷的記述，不僅論及宣卷的傳播區域特徵，而且還就唸卷時的人員、形式、場所、時間以及所見到的大多數唸卷底本的抄本內容和中心思想，進行了較為細緻的剖析，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民間對於宣卷的認識以及影響到民間精神生活中的情景。這有助於瞭解江蘇、浙江地區民間宣卷和寶卷的發展情況，同時也對於吳語區域文化格局的歷史研究有所幫助。因此，可以說根據實際調查對近現代上海民間宣卷較早的綜合介紹文章，為研究寶卷的歷史和現狀，提供了可貴的資料；而在研究方法上，能運用田野調查與歷史分析相結合的特色，更是有較大的參考價值，這是此前寶卷研究者所未從事的，因此更應當引起寶卷研究者的關注。

〈《洛陽橋》〉刊載於周刊第三十四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敘述：「『蔡狀元起造洛陽橋』的故事，流傳於各地的唱本、宣卷、戲曲民間者，為數甚多。」「所謂洛陽橋，並不是河南洛陽的洛陽橋，係福建泉州的洛陽橋。此橋本名『萬安橋』，建於唐代大曆年間，觀察使裴冕，置萬安監牧馬於

此，所以就名『萬安橋』。至後唐宣宗遊泉州時，曾經此橋，據云『此地方風景頗似洛陽』因之改名為『洛陽橋』。」「泉州人傳說：宋皇佑五年，蔡中惠公襄守泉州時，大修洛陽橋，上建三座亭子，公自為紀，手書勒石，樹於橋南。當修橋時，潮漲水急，不易施工，公於是為檄海神，招募能投公文者，一名醉漢應募前往，臥海灘半日，酒醒時見檄文已開，其後有一『醋』字，蔡公大喜道：『此乃告我八月二十一日酉興工也。』及期，果然水低潮緩，施工不久，即告成功。後人感謝蔡公德政，即在其處建祠祭祀」。有此一說：「洛陽橋為蔡襄守泉州時所造。陳萬里先生在『閩南遊記』中所照的『洛陽橋』照片確是一條很大很長的橋。又有一個三縉長鬚，道貌岸然的石像。手執一牌，上刻『醋』字，這就是下海送文的夏德海了。」

文章論述所得《洛陽橋寶卷》抄本，比較泉州的傳說，其中大部分是不同的。抄本所敘「唐朝忠臣蔡昶，有一子名瑣，聰明好學，已娶竇氏為妻。蔡瑣二十歲時，進京趕考，得中狀元。蔡昶忽生『騎樑反背』重病，蔡瑣即行回家。回家時黑霧瀰漫，誤入了貴州府陰界。見到已死的丫鬢梅娥，就到她家，她已嫁與第七殿閻王的馬面判官為妻，他們兄妹稱呼，以見馬面。翌日，蔡瑣要求馬面帶他一遊閻王殿，見到鄰居胡大賓剝削他人，陰司罰他將火盆蓋在靈魂頭上，陽間的活人頭上，即生熱瘡。又見作惡的王勝良靈魂在油鍋裏煎，活人即生寒熱病。繼見自己父親被稱勾掛在樑上，係不信神明，應得『騎樑反背』之病而死。蔡瑣要求馬面拯救，馬面乃與承法庫張順商量，借的陰府庫銀十兆九萬有餘，賄通了三十六房，七十二案，才救蔡昶出罪。蔡瑣回到陽間家中，備齊了銀子，即行送去歸還，但走不到陰司。後為一老人指點，就在貴州江陵地方預備造一座大橋，以通陰間。乃請天下木工石匠，張魯二班師傅，動工起造。此橋要造七十二環洞，眾匠人努力造到三十六個環洞時，已到海心之中，水大浪急，無法施工，須將海水收乾，方可做工。蔡狀元寫了文書，招人下海投送，公差們提的醉漢夏德海，叫他下海送文，德海醉臥海邊啼哭，驚動了巡海夜叉，稟明龍王，知係蔡狀元要海水乾了，以便造橋，龍王乃朱批『肚』、『醋』二字，夏德海醒來後回覆，蔡狀元知道在十一月二十一日酉時，可以水乾施工，張魯二班師傅即行準備妥當，到十一月二十一日酉時，海水果乾，即速打完了三十六個橋樁，進行工程。那時，觀音娘娘見到狀元起造大橋，工程浩大，尚少銀錢；於是變了個絕色寡婦，她宣言說，有人用金銀打得到她身體時，即許配為妻。眾人見色迷人，傾城的人用金銀擲她；她又面朝著張順，將七庫

銀子擲完，但都未擲中。狀元於是得了無數金銀，工料費有著，造完了裏面的三十六橋洞。造橋時因工程浩大，眾神齊來幫助，狀元造完了，即轉家門。而陰司的閻王查庫時，見到少了庫銀，於是將馬面與張順治罪，幸得觀音娘娘前去說情，將此債分派在投生的各人身上負擔，所以每人都有『投生債』的緣故。其後夏海德封為舉人，蔡狀元也修行功成，成佛云」。最後又指出「在淮陽唱本《洛陽橋》裏的事蹟，與寶卷中所表現者一般無二，惟唱本中之狀元為『蔡項』。瑣與項。當係字誤，無大關係。惟傳說中的蔡狀元，是唐朝人？抑係宋朝的蔡襄？當然不能證明。然而，蔡襄與泉州洛陽橋發生過關係，可以斷言」。文章同時也指出洛陽橋傳說在民間習俗風尚上反映出「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關係信仰」，「觀音化裝騙人擲銀，傳係『花會』的起源」，「每個人都有『投生債』的觀念。故有請道士或唸宣卷者，或到東嶽廟裏『還投生債』的風俗，盛行於上海」。文章最後引何喬遠《閩書》說明這種傳說，不僅流傳於民間，「而且筆之於正書了」。此文是較早的論述了民間傳說故事與寶卷以及正書（官方的記載）在民間禮俗之間，似乎是有著密切相關的聯繫，相互間的影響結果，是人們宇宙論、生死觀的具體反映。這裏所論述的，可以說為寶卷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寶卷提要〉刊載於周刊第三十五、三十七、四十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九日、三十日，星期三，五版。文章分為：小引、寶卷敘錄。文章小引中沿用鄭振鐸先生寶卷說「寶卷古稱『佛曲』，為江南最古老而普通的通俗文學」。指出鄭振鐸先生〈佛曲敘錄〉中，「惟所收的都是坊間容易買到的刻本」。「這裏介紹的一部分寶卷的故事，都是抄本，為唸卷先生宣唸時所用底本。雖然他的內容，有時與刻本有些相同，但是其中另有一番景色」。指出「抄本寶卷的拙劣、錯誤，別字多，不近情理，字句不通」但「都是顯明地為刻本的祖本」。認為這些故事作為研究俗文學的一種資料，應當得以面世。以下即將陳文六種寶卷提要，敘錄如下：

《蝴蝶寶卷》一名《梁山伯祝英臺》，抄本。內容是，周朝時孔夫子在杭州開蒙館教書。諸暨人梁山伯，年十七，帶了書童，前往杭州讀書。又有會賢人祝英臺，女性，十六歲，亦要到杭州孔夫子處讀書，父母不允，英臺乃女扮男裝，化裝為算命先生，算了自己的命，父母見她扮得不錯，所以允許了。而其嫂子又要阻止，英臺乃摘牡丹一枝，插在瓶中，誓以己身不貞，牡丹花即行枯萎。英臺乃帶了使女，二人都扮了男裝，同赴杭州。在路上的歇涼亭裏，遇見了梁山伯，二人聚談

之下，甚為契合，乃結拜為兄弟，同在孔夫子處用功讀書。二人食同桌，坐同凳，寢同床，英臺多方設計，瞞過山伯，識不出她是女性。三年以後，英臺恐怕久在一處，終要識破，乃辭別回家。山伯送她至錢塘江畔，英臺屢次以隱詞點破自己是女身，山伯始終不悟。英臺乃囑以日後回家時，須先從祝家莊經過，便可將小妹許配，二人乃揮淚而別。英臺回家牡丹花鮮豔如常。會有馬俊者，向祝家求娶英臺，祝老許配，已擇日成親。梁山伯從杭州回家先至祝家莊探視，方知英臺是個天仙般的少女。然而已婚馬俊，不能與山伯結為夫婦。山伯失意而回，一病不起，在英臺嫁前二日而終。遺囑葬在城西阜橋關上，請英臺花轎須從墳前經過以祭。英臺臨嫁，准其所請，坐了花轎到山伯墳前哭祭，不料天昏地黑，飛沙走石，新墳崩開，英臺即鑽了進去。使女連忙拖拉，只得腰裙一角而已，墳乃合攏，只見一雙蝴蝶，在墳上飛翔嬉戲。馬俊以嬌妻被劫，悲痛萬分，乃自縊而亡，向閻王控告梁山伯劫奪其妻，閻王查明山伯、英臺有夫妻之緣，與馬俊無份，賜三人吃了還陽酒還陽。馬俊還陽，說明因果，另行婚娶。梁、祝二家得訊，掘出英臺、山伯，結為夫妻，遂往杭州，二人的書童使女也配為夫婦。後來山伯考中狀元，英臺兒子冬生，也做大官。二人看破紅塵，修行學道，菩薩度他們上天。案此寶卷，李世瑜《寶卷綜錄》頁十五第一三一條；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頁一一一第〇六二八條，均著錄。

《妙英寶卷》一名《妙英白衣大士寶卷》。內容是：宋太宗時，東京城外太平莊上徐文慶，只生一女名叫妙英。從小吃素唸經修行，不願嫁人，十七歲時，為劉媒婆設計，配與王效文子承祖為妻，擬於正月半，夜裏看燈時搶去成親。到了元宵之夜，妙英的丫鬢與父母，千方百計，哄騙她去看燈，妙英不為所動，其父大怒，勉強答允，穿了隨身衣服而去。乘轎到了天漢橋邊，為王承祖埋伏的家人所劫搶。妙英掙扎呼救，驚動了靈山教主如來佛，即差觀音大士，護法微服，雷公雷母，前去搭救，眾神們將妙英救到白雲山石室中靜心修道，禽獸們為其服役。妙英之父文慶，聽信謊言，以為妙英為承祖謀害了。乃往開封府告狀。狀准，王承祖被拘，吃盡了刑罰，屈打成招。會太宗大赦天下，承祖得以不死，為刑部周天佑發配充軍。承祖與公差等，經過白雲山，聽到木魚及唸經聲，循聲而往，得見妙英。雙方敘明原委，承祖乃拜妙英為師，同處修行，公差等回衙稟告，開封府太守，及徐、王二姓闔家老小，到白雲山，一起跟隨妙英修行。案此寶卷，李世瑜《寶卷綜錄》，頁三十二、七十三第二六九條；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頁二十八至二十九，第〇一三二、〇一三三條，均著錄。惟兩書沒有著錄《妙英白衣大士寶卷》一名。

《養親寶卷》俗名《張待詔買爺叫》，抄本。內容是宋仁宗時，東閣大學士王儀，常熟人。雖有十八個太太，俱未生兒子，而家財富有，有十七月典當。王儀告老還鄉之後，周倉託夢與王儀，說命中註定有一子，已錯判在姑蘇孝賢村上，然可以尋到。王儀乃與眾妻分別到蘇州尋兒，以半把芭蕉扇即為兒子的記號。王儀到了蘇州，即出賣自己為人家的父親。蘇州萬安橋孝賢村，有張乾者，以待詔為業，父母已亡，妻朱氏，甚有賢德，已生一子名文郎。張乾夫婦，欲盡孝道乃買王儀回家供養。王儀在張乾處，要試其心，所以要吃糯米朱砂餵的雞，燕窩養的鴨，鱘鱓粉蛋白擀麩。張乾一一依從，將家產賣了以養其父。王儀，命將稻花摘去藏好，他也答應。王儀欲穿皮袍，張乾賣了兒子文郎來做皮袍。張乾的孝心，感動了上天，上天乃下咳嗽病於人間。皇帝皇后、三宮六院、文武百官，都患咳嗽病。呂純陽乃點化須用稻花湯，方能醫治。行令天下，得到了張乾的稻花湯而治好咳病。張乾得到皇帝的賞金，為父舉行盛大的慶壽，欠了七、八百銀子，王儀命將半把芭蕉扇，到常熟中和當舖去當銀千兩。當扇時發生爭論，為王夫人查知，見了芭蕉扇，知是王儀尋到的兒子。乃接張乾夫婦到家團圓，改名王乾。王家財產，歸王乾管理。王儀則淨心修行，為太白金星度上天去。王乾的長子文郎，次子文虎，後來都中了狀元。案此寶卷，僅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頁二四三第一四一〇條著錄。

《玉連環寶卷》，抄本。內容是元和縣孫凌雲者，家財萬貫，房產甚多，父母雙亡，取妻梁紅芝，甚有賢德，妻弟梁鳴，遷居貼鄰。有包光德者，為賭棍密騙，將凌雲騙上了賭場，不想回家。紅芝以為他在尋花問柳，擬以美色來籠絡他，自行物色趙月姑以為其妾，月姑係書香之女。從小女扮男裝，隨父攻讀經書，因母死喪費無著，故自願嫁凌雲為妾。當紅芝在月姑家中聘禮時，凌雲已將家中所有契據，全部竊去。紅芝得悉，與包弟商議，由紅芝拿出私蓄，歸趙月姑出面承購凌雲手中產業，免落他人之手。月姑男子打扮，化名趙旭齋，購進房地，遷入居住。凌雲將賣得一千八百兩銀子一口氣賭完，又欲將髮妻出賣。紅芝又請月姑出面，買她為妻。凌雲又將妻賣三百兩輸完。乃彷徨歧途，計無所出，只得在趙月姑家為管事，改名悔初。又在趙府賭博，被月姑將薄情郎杖責三十。凌雲乃回心轉意，用功讀書，在上京趕考的路上，紅芝授意家人提破，一切俱係夫人紅芝之計畫，趙旭齋係其二夫人月姑化裝化名。凌雲明瞭，心花怒放，考得舉人，一妻一妾，美滿團圓。而惡棍光德，則不得善終。案此寶卷，李世瑜《寶卷綜錄》，頁六十一第五三二條；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頁二六二第一五四四條，均著錄。

《白鶴圖寶卷》，抄本。內容是鎮江府丹徒縣王玉安，官居通政之職，只因朝廷奸臣弄權，告老回鄉，為官清正，毫無積蓄。夫人楊氏，長子子琴，娶媳丁氏，子琴赴京趕考後六年，並無音訊回家。次子子連，年方十六。適逢那年荒年，家中毫無活命之本，一家四口，苦楚異常。長媳丁氏，乃將聘禮金釵一枚，託叔叔子連去變賣，子連當得五兩三錢銀子，回家時，見抱頭村上周二殺子養親，子連將銀全數相贈，救了周家老小性命。回家無錢覆命，被父責罵，出外擬在林中上吊未成。後行至一巨宅，被雇傭家人王仁留住。王仁的新主人莫見章，單生一子名莫恩，是個醜陋不堪的「十樣景」。恰巧子連到莫宅的次日，是莫恩結婚之期，到結婚時，莫恩羊癲瘋發作，乃將子連代做新郎，送往何家結婚。王玉安夫婦，因飲食不周，有病臥床，幸丁氏看護得力，得以無虞，丁氏曾向父母處告貸錢無著，反被辱罵。丁氏乃求乞以養二老，然王安聽信讒言，疑丁氏在外不貞，將她改嫁與馬見成，得銀百兩。丁氏得悉，在房中哭泣，擬祭奠祖宗後自盡。適有義賊一枝蘭，想到王家偷竊，洞悉丁氏行為，回家與妻商議，將在京城裏趙翰林處偷得之白鶴圖一幅，黃金千兩，冒名王子琴，寫了一信，枝蘭偽稱子琴已中狀元，出國平番，黃金為安家之費，白鶴圖為信物，數日之間，即將返家云云。闔家大喜，乃得平安而過。王子連在何家成親，後一月轉回莫家，何員外伴同前往，方悉女婿是個「十樣景」，王子連是個代表人，何員外大鬧，將女全配了子連。「十樣景」莫恩當場急死。莫見章見子已亡媳被奪，甚恨子連，乃命周二（即子連所救殺子養親之人）去殺子連，周二報了恩救了他。子連為避免日後危險起見，乃與嫂子丁氏商議，丁氏即將白鶴圖一幅，銀百兩，到京找尋哥哥子琴。

子連到京後，銀子被竊，於是將白鶴圖掛出出賣，為物主趙翰林查獲，捉住王子連，屈打成招，又悉王玉安之子，前曾將女許配，反為所拒，憤恨異常，預備將他燒死。然為趙翰林之女玉娥小姐所救釋放，又被趙翰林捉住，送往南京府治罪，知府楊乾，不問情由，將子連下獄。玉娥小姐得知，命丫鬟白梅，將自己八字，到監送與子連，說他兩三歲時訂婚，趙翰林欲賴婚陷害，待清官到時上訴。一枝蘭知道子連被禁，乃向南京府自首，同收入監。入夜，枝蘭出了監門，到知府書房中，用香薰倒了楊乾夫婦，竊取印信，將知府的鬍鬚剃去一半，題詩而去。王子琴自從考中了狀元，被奸臣作對，奏他到外國去了六年有餘，回國後封為操江總督，適此時到南京。一枝蘭盜了總督令箭，去調知府楊乾，同見總督，稟明前後原委。子琴乃調趙翰林及子連與趙玉娥對質，子連提出玉娥庚貼，說趙翰林賴婚圖害，案情判

明，玉娥配子連為妾，即日成親。楊乾則削職為民。一枝蘭拔為中軍之職。子連在京，用功讀書，考中翰林。兄弟二人衣錦回鄉，十分榮耀。子琴與丁氏，子連與何、趙二夫人，子孫繁多。丁氏將白鶴圖懸掛經堂，焚香誦經，七十歲時白鶴度她上天，原來丁氏為王母娘娘左邊的仙女。案此寶卷，李世瑜《寶卷綜錄》，頁二、六十八第〇一一條；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頁二六二第一五四四條，均著錄。

《審陰寶卷》，抄本。內容是宋仁宗時，龍圖閣大學士包文正，有烏臺一座，鐵面無私，斷明了三十六件無頭大案。有祥符縣民人邱生，父母妻子俱亡，無親無族，貧困至極，以為閻王待他不公，派為窮人，使其受苦；於是具呈控告十殿閻王，徇情不公，貧富不均。包公准狀，命公差陳江將硃籤牌票，傳達閻王到烏臺聽審，陳江以為只有閻王拘捕陽間人，那有陽間人去拘閻王之理？大哭求免，包公又派了本地城隍一名同去，陳江無奈，自縊而亡。包公即將牌票等焚化，陳江在陰司與城隍同去。陳江之妻向包公吵鬧，包公命她靜守屍身七日，自會還陽。案此寶卷，李世瑜《寶卷綜錄》、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均未著錄。

這六種寶卷都是「唸卷先生宣唸時所用底本」，雖然抄本的源流、時間尚不清楚，但是這對於相關寶卷的研究，還是很有參考意義的。陳志良有關寶卷研究的論文，刊布較早，但由於早期俗文學研究文獻罕見，故多為研究者所忽略。

魯男子（原姓名不詳）：

〈我也談談蹦蹦戲〉刊載於周刊第五期，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六版。文章寫到近期看到《大晚報》所刊登的關於蹦蹦戲的討論，其中阿英、想阿寶、趙景深、亦新等先生的文章，都有較詳細的論述。然而對於有些論述似乎又誤作者指出「蹦蹦戲確非起於奉天，是起於關內灤州。昨見亦新先生訪問白玉霜、安冠英一段，說是其於唐山和蘭州，這大概是言語之誤會，以灤州誤聽為蘭州。灤州即現在河北的灤縣，離唐山不遠，所以蹦蹦戲的道白，都是當地的灤州土音。蹦蹦戲是出於灤州皮影戲。灤州在清末，有一種專靠影戲吃飯的人」。其後皮影戲演技漸漸衰弱，但是其所唱詞句即為蹦蹦戲腔調使用。「民國初年，即盛行於天津，搭棚演唱，風行一時」。在談到蹦蹦戲的蹦蹦二字，文章認為「蹦蹦戲有人以為應作『蹦蹦』，有人以為應作『蹦蹦』，要討論這個問題，應先知道蹦蹦戲最早的表演形態，不能以白玉霜〈芙蓉花〉的演唱為準。蹦蹦戲的演者，是要自始至終兩肩聳動兩足跳動的」。接著引「鈺靈芝唱〈花為媒〉時，張五可在小生面前唱的時候，

說『你看看我的前邊，你看看我後邊，我再給你走上兩步走』。當她走的時候，梆子敲得格外響，她渾身上下，很起勁的擺動，這還留有蹦蹦戲遺形」。同時指出「現在天津落子館，有時候會看到這真正蹦蹦戲，他們無論男女，肩手臀腿，都在一跳一跳的，小生手拿一根槍，是不斷的隨唱隨動一聳一聳的，小老媽是一手拿著手巾一手浮空，滿頭戴著可以顫動的絨花，或鮮茉莉花。唱起來全身顫動，既有肉感，所以能引誘年輕的人，經政府禁止以後，這種動作，亦就變更。像白玉霜她們的演唱，已經與舊式大不相同，謂為改良，亦無不可」。最後文章認為蹦蹦戲，應該以蹦蹦二字。至於阿英先生說所有唱本多用「嘯」，疑為印刷的原故。

顧仲彝 (1903-1965)：

〈關於通俗文學的一個建議〉刊載於第六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星期三，五版。文章針對鄭振鐸先生〈建設新的通俗文學〉一文而論述：「前幾天在《火炬》上看到好幾篇關於通俗文學的文字，我覺得都是非常中肯而重要，尤其是西諦君的幾個進行步驟最為具體可行。新文學仍然是少數知識青年的獨占品，嚴格說起來，新文學的領域反小於舊文學，尤其在近來復古思想盛行的一兩年。新文學始終沒有走入大眾的人群中去，這一方面固然是新文學家的文字體裁過於歐化，不能使大眾感到興趣，一方面因為中國的大眾知識實在太淺，成見太深，對於新文學便格格不入了。例如話劇的提倡已有了許多年的歷史，但是成績可憐得很，一般的觀眾仍然只願意去看《火燒紅蓮寺》不願意來看《娜啦》。提倡通俗文學就是在大家間提倡新文學，用誘導的方法，使他們都走上新文學的途徑。通俗文學的卑陋淺薄，人人知道，我們要利用它們的材料，作一番改革，創造，使通俗文學新文學化，同時使新文學通俗文學化。我們的目的並不在降低新文學的程度，而在提高通俗文學，不過方法上不得不從新文學通俗文學化上著手不可。」「西諦君所提的一、收集。二、改良。三、創造。三個步驟是再中肯而妥當沒有，不過這種工作絕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所能擔負得起。譬如『收集』一件事，必須各方面的人在各地去進行，絕不是一年半載所能完畢。我主張集合許多對於這問題有興趣的人組織一個社，大規模地幹一下，有系統地做一番，不然始終是紙上空談，無濟於事，譬如去年大眾語的問題討論到如此熱烈，結果卻等於零。中國的許多事情只有人說沒有人做。說得大家同意了，我們就應該埋頭去做」。

旅 岡（盧豫冬，生卒年不詳）：

〈談傀儡戲〉刊載於周刊第八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三，五版。文章論述「傀儡戲在中國的起源頗早，據《列子·金樓子》中就有所記載，周穆王時曾有匠人優師刻木人求見，是以作傀儡戲。可見周時即有是項戲具，不過是否誤傳，目下尚無可考」。然而作者認為較早的具體記載，引《後樂府雜錄》，並說「而杜佑《通典》及莊季裕《雞肋篇》則說是『漢未始用之於嘉會』」引《雞肋篇》說明。同時認為「兩條記載，大致雖有出入，但傀儡戲在漢時即已流行，大約是無可疑義的」。接著引《封氏聞見記》說明喪家樂用；又引文說明有人以傀儡戲作酌酒行觴的點綴，即六朝謂「舞鬚子」者是；後來關於歌詠傀儡戲的詩詞亦頗多，引唐玄宗曾作〈傀儡吟〉，饒有趣味；黃山谷亦有傀儡詩之作；明時唐伯虎亦作傀儡詩，隨後李攀龍更作了傀儡詞。「在歷代，傀儡多係宮廷及貴族之家的玩具，故又名之為宮戲，而傀儡戲之名，則亦因之而有，隨時隨地的稱謂不同：有名之為木人戲者，亦有名之為木頭戲者，但大抵上以傀儡戲為最普通之題稱」。考傀儡戲之名，有記載的如杜佑《通典》、莊季裕《雞肋篇》、黃山谷《陪翁雜記》，自宋朝以後，傀儡戲的記載多起來。清朝鼎盛之後，傀儡戲不復出現於宮廷，但是在民間流行甚廣。文章最後引文敘述國外的傀儡戲情況，如 Robert E. Martin 的文章，論及義大利傀儡劇團的情形，以及英國、捷克斯拉夫、蘇聯等等情況。

金性堯 (1916-)：

〈談打油詩〉刊載於第十六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星期三，五版。文章認為中國舊詩「第一是因為裏面的典故太多，如果沒有話解，簡直只有十分之六七可懂。第二是因為它跟時代的動脈幾乎隔絕。第三是它和大眾離得太遠了」。然而有一種叫作「打油詩」的，它的詞句接近俚俗，作時不用典故，作者以為很有意義。

〈談四明文書〉刊載於第十七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六版。文章敘述「『四明文書』是浙江很著名的一種歌詞，一作『四明南詞』，它的發源地點，大概在寧波……」唱的時候也有五人或七人，除主要唱書者一人外，其餘幾人都是彈樂器，有簫、琵琶、三弦之類，聲調非常單調，音亦很輕幽。四明文書的目的，千篇一律以才子佳人作為故事的背景，如《珍珠塔》、《玉蜻蜓》、《雙珠

鳳》等等，唱本在坊間很難找到。作者在《大戲考》翻到一段，何貴章唱的「果報錄思唐」內容都是從《果報錄》原書中抄錄的。引例於後。

〈關於王寶釧和她的丈夫〉刊載於第二十一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敘述熊適逸先生將評劇《紅鬃烈馬》翻譯成英文，改名《王寶釧》在國外上演後，雖然產生了轟動，但是翻譯後的劇情，失去了原意。並結合劇情內容，進行了分析評價，認為洪深先生評價正確，王寶釧不足以代表中國歷史上的進步女子的想像，介紹到國外去。

〈記故鄉的唱新聞〉刊載於第二十二、二十三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九月二日，星期三，五版。文章論述作者的故鄉，浙東定海，以歌唱來糊口的盲翁，叫作唱新聞的。但是所謂的「新聞」，係指編排故事的當時而言。延續下來，已經成為一種不易的代名詞了。實際上他們所唱的也就是一些故事，並不是什麼「新聞」了，也就是一種流傳在民間說唱故事的形式。文章敘述了盲翁唱故事的形式，以及故事的內容。

毛 桿（金性堯）：

〈記《小慧集》〉刊載於第三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五版。文章論述所藏《小慧集》，十二卷，道光年間貯香主人輯集。其內容大都是記述當時所通行的消閒玩藝的「訣竅」，逐一引述，如：「輪流妙術、諸結圖式、移棋相間、四書牌譜、瓶花忌水、崑劇新聯、暗馬數法、邪牌藻異、養百靈訣、雪香鑼鼓、金魚圖譜、管窺集諺、牙牌湊巧、運筆層次、暗加兵訣、三國象棋、西廂酒令……」等等四十種類；又續集六卷，有「族望類譜、古篆源流、古錢圖說、俗語新聯、集古磚文、打馬圖例、書學三叉、太陰演卦……」等十二類。作者認為此書最能夠給民間文藝研究人員提供參考的，是其中一篇抒情小調和幾句民謠。並有曲名「紗窗調」、「繡荷包」、「歎五更」、「紅繡鞋」、「楊柳青」、「淒涼調」、「鮮花調」等七種。並抄錄「紗窗調」、「歎五更」。對於「歎五更」一曲，作者認為：「我覺得這首實在是不差，把娼妓們內心所感受的痛苦，很簡單地表現出來了。在民間唱曲中我們如果留心的話，就可以看到社會情形之一斑。」同時感慨「道光去今，雖不能說是遙遙之遠，但總覺不近吧？而這種苦痛，在目前還依舊普遍地存在著」。文章最後闡述「關於《小慧集》的價值如何，劉半農先生在《語絲》周刊第六十七期上曾經說到『《小慧集》不是部稀有或珍貴的書，但也總

的要是常常逛地攤的人才能看到……』」作者所藏「不曉得跟劉半農先生所藏的是不是同一版本？因為劉先生所抄的小曲，和我的相勘，內中有幾個字不相同」。

金性堯先生結合當時代，寫了許多反映時事的歌謠，如：〈新歌禮讚〉（第 25 期）、〈開學謠〉（第 26 期）、〈飛機四字謠〉（第 33 期）、〈賽金花新謠〉（第 36 期）、〈支那的小販〉（第 37 期）；以下署名毛桿，發表的作品，如：〈看報謠〉（第 22 期）、〈丐車謠〉（第 23 期）、〈名媛謠〉（第 28 期）、〈悼賽金花及其他〉（第 37 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現狀。他在俗文學、民間文學方面的研究工作，過去亦多為研究者所忽略。

陳子展 (1898-1990)：

〈《一法通》中之巧對〉刊載於第九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三，六版。文章敘述《一法通》一卷，臨湘吳懈著。因原書不易得，見者不多，引文介紹。此書「為舊式啟蒙讀本，屬於太公家教增廣昔時賢文一類」。內容包含諺語、格言、古人雋語名句，以及世俗相傳的名聯巧對。諺語以流行於湖南方面的為多，作者已經在《申報·自由談》中介紹。本文主要選錄名聯巧對，予以說明。「《一法通》依韻目編次，有如聲律啟蒙」。

〈孔夫子選女婿〉刊載於第十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星期三，五版。本文是一首詩。根據文章後的敘述，不是作者的創作，原稿是杜子勤先生寄來的，是從張逸民處得來。作者原想作為《孔子與戲劇》書的附錄，後來增加了三分之二內容，原字句略作修改，以求風格上的統一，寫成了詩。

玄（原姓名不詳）：

〈打彈弓〉刊載於第十期，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星期三，五版。文章論述「民謠是民眾思想結晶的表現，在民俗學上占著極重要的地位，而民謠中尤以戀歌為重要的部分，各國莫不皆然」。究其原因「是說：赤裸裸的戀情的表白，從前文學家卻沒有這些顧忌，所以遂借了民謠的形式而產生出來；因為表白民眾真摯的男女悅愛之熱情的，民眾自然極歡迎而且傳布得快。又因為不愛文學上傳統的拘束，不愛受法吏的檢查，所以自由創作，故出產甚多，久而久之便占了民族的民謠的大部分了」。對於「中國民謠裏的戀歌，古代的如〈子夜歌〉，現在留傳的極少，且已非口頭文學。現在流行於民眾口頭的，卻是極多，並且內容也更豐富，更變

化」。作者全文引江南通行的〈打彈弓〉，這是一首很好的戀歌，約有一百多行，男女問答的形式。最後指出內容，以及此長篇戀歌以對話體的形式，似乎很少，所以作者認為此戀歌是特出的。

施 誼（孫師毅，1904-966）：

〈民族解放進行曲配合著永續不斷之戰鬥精神的「鏈鎖體」——一個歌曲新形式的試作〉刊載於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五版。

伯 韓（曹伯韓，1897-1959）：

〈平江的山歌〉刊載於第十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六版。文章論述平江是臨近長沙的一個縣，那裏的習俗大體與長沙通。每逢春天採茶或種稻時，田野裏到處充滿著悠長的山歌聲。內容大半是平江人所謂「山歌無姐不成腔」，便是恰好的說明。山歌的形式有種種，有獨唱的，對唱的等。文章列舉了三首。

牟（原姓名不詳）：

〈清人小調輯逸〉刊載於第十四、十六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一、十五日，星期三，五版。文章分為：一、羅江怨；二、黃柏木；三、才郎含笑；四、「人人說我有了你的心」；五、玩月對嫦娥；六、不薄新交愛舊交；七、百種春情在眼梢；八、春夜不成眠；九、「相思閑坐意沉吟」；十、中秋明月；十一、相思；十二、怨恨；十三、好比；十四、好馬也換了槽；十五、算命。

〈彈詞開篇輯逸〉刊載於第十八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五版。內容有，一、別愁況；二、題風；三、閨怨；四、禿秋。

金 寶（原姓名不詳）：

〈一首民間流行的新歌〉刊載於第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七月八日，星期三，五版。本文是救亡運動的新歌，內容以當時津沽白河發現數百具流屍的新聞為題材，採用民歌的形式以及詞句等技巧寫成的。全文約四十句，簡明扼要，通俗易懂地深入到民間傳唱，揭露了此事件，對於救亡運動有一定的助力。

施 沖（原姓名不詳）：

〈民間的長山歌〉刊載於第十七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六版。文章敘述在民間的山歌中，最多就是每首四句的短歌，內容多是情歌，此類短歌便另立了一類，叫做四句頭山歌。因此長歌便少了，作者在江蘇青浦縣某個鎮上聽到一首長歌，引錄下來，「南風吹來北風涼，阿姨頭上菊花香；農末生來像啥腔，農姊妹生來能有樣。……」並略分析內容以及寫作方法。

葉德均 (1911-1956)：

〈《小說閒談》阿英著〉刊載於第十九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指出中國通俗小說的研究，從事實的校訂和摭錄舊聞（如《小說叢考》等）到作者考證（如胡適的諸作），再到故事、版本演化的研究和書目提要的編纂（如鄭振鐸、孫楷第的著述），已有三個各不相同的階段。現在的研究，大都是偏於最後一類，也就是致力第三階段的工作。據作者所知道趙景深的《小說閒話》和阿英的《小說閒談》兩部書對於這階段的研究，似乎是有較多貢獻的。於是對於阿英的《小說閒談》作了較詳盡的評介。

〈「鼓子詞」雜話〉刊載於第二十四期，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五，五版。文章分為三部分論述：（一）類別與源流。此部分論述同名為「鼓子詞」的，從它的歷史方面來看，至多有三種，一為宋人所作蝶戀花的詞；二為明清文人模仿通俗俚曲的作品；三為現在流傳的「鼓子詞」或「鼓兒詞」。本文所要說明的只是第二種明清文人之作，但是為了說明源流，同時也涉及到其他兩項。（二）賈應寵與蒲松齡。文章認為「賈蒲式的作品，在外形上與其前後的『鼓子詞』都有不同之點，大約是本著當時民間流傳而作的」。分別介紹賈應寵和蒲松齡的生平以及作品。（三）作品上。（四）作品下。作者認為據傳為賈、蒲二氏以及其他人所作的「鼓子詞」，分別列出，有三十一種。

均（葉德均）：

〈《今古奇聞》中的「林蕊香」〉刊載於第十九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星期三，五版。文章指出在清代《今古奇聞》中的一篇傳奇文〈林蕊香行權計全節〉的來歷，出自偶然檢索到王韜的《遁窟謠言》中「林蕊香」條。查王韜此書光緒元

年於香港主辦《迴圈日報》時才刊印，《今古奇聞》即選自《遁窟謠言》，最早刊印也在王韜書後。引證實例說明。

狂 絲（原姓名不詳）：

〈〈沈六官〉〉刊載於第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七月八日，星期三，五版。本文是作者於民國二十三年，在江蘇常熟鄉村裏消夏時，費盡了許多心血，蒐集到的在對白民歌裏較長的一首。全篇民歌裏，情節婉轉，歌詞優美，充溢著男女熱情的流露。作者認為「在民間文學的領域裏，這是一首真摯的熱情的，又甜情的歌，其價值又還在矯揉造作的作品之上，宜其該永久地流傳在鄉村裏了」。

〈〈十別〉〉刊載於第二十一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三，五版。本文是作者在常熟老家的鄉村裏，通過邊唱邊記錄的方式，一句句抄錄下來的一首較長的民間情歌。作者深感此民歌的內容，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真摯的長篇散文詩，韻節是那麼自然，滿篇充溢著纏綿、哀怨、悲苦、沉悶的情緒，反映出封建思想支配下的封建家庭的毒害和冤屈，使得很多女子被摧殘了、犧牲了。同時認為常熟——是民間歌謠發生得最豐富，也是最美麗而和諧的地方。

〈〈徐大郎〉〉刊載於第二十八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三，五版。本文記述了作者暑假期間，回到故鄉，正值秧田穗好，農夫狂歡的時節，採集到的一首很長的、富有時代特點的民歌。其內容是一首長約一百一十五行的情歌，映射出當時鄉村裏現實生活的景色。吟唱起來覺得有無限的快感，和諧而輕鬆。

黃 勻（生平不詳）：

〈「花鼓戲」的史料〉刊載於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五版。文章引文論述花鼓戲若就近源說來，當由山歌蛻化而成，也亦山歌的戲劇化。而在江浙一帶流行的情況，引文說明它流傳江浙一帶始於乾隆年間，當無可疑。

〈《說書小史》〉刊載於第二十六期，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五版。文章對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我國第一部說書專史，陳汝衡著《說書小史》的評介。

若 愚（原姓名不詳）：

〈關於改良民眾讀物〉刊載於第三十五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

三，五版。文章論述近來從北平帶來了一個消息，顧頡剛等近來對改良民眾讀物的工作，頗努力進行。擬進行三項推進，「一、調查工作；二、收集與改革工作；三、訓練唱大鼓書與評書藝人」。關於第一、二項工作，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如：《中國俗曲總目》的出版，《定陶秧歌選》（平民教育促進會的調查定陶秧歌曾出版），以及顧頡剛《吳歌甲集》等等。作者認為：「但是他們這些人的工作，乃不過是做了消極方面的貢獻，至於積極方面的改進工作，現在顧頡剛等，特別著重在改革方面，他們的工作範圍，除文字的讀物外，連小人書（即連環畫）亦包括在整理改革之列。從前人們都沒把流行在大眾之中的連環畫或年畫放在眼裏，其實這些東西，大有它存在的社會意義，與一般的通俗讀物（說書唱本、歌謠小曲之類）同樣地占有好多民眾，又因圖畫的形式較之文字的工具，其傳染感情的力量，更是顯得通俗普遍而有力，不能理解文字的人，他卻能藉著書圖，來瞭解一個故事；所以這些畫，委實又代替文字說明的功能，正好是一般未受到什麼教育的群眾的課本。」而且「未獲得教育機會及教育程度低淺的國民，在全國人口中，仍是占一個大數目，所以許多通俗的章回小說、說書、唱本、曲詞、連環畫、年畫等讀物，都得到了這些群眾的愛護，深入了群眾意志裏，幾乎成了這些人們的思想的規範，而影響到他們生活上的一切。……簡直形成了一支『教育的勢力』。因此，通俗讀物對於群眾的教化、薰陶上，是有相當的力量與勢力的」。對於第三項作者以為：「訓練唱大鼓書與說評書藝人，這可說是創舉。……除對新讀物加以唱述訓練外，關於灌輸民眾知識之普遍有效方法，也注意到它的研究與改善。」

總之，《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刊載的俗文學研究文章，內容包括俗文學理論、民歌、歌謠研究、寓言、民間故事研究、宣卷、寶卷研究、俗曲研究、彈詞、鼓詞研究、小說、戲曲研究、俗文學資料、通俗文學作品和實地民間調查報告等，文章的篇幅長短雖各異，即有長篇連載，也有短文，但所考論，立足實證，大多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周刊所刊布的俗文學研究成果，既能代表當時所處時代的研究水準，為學術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同時也有力地推動了俗文學研究的開展。由於早期俗文學研究文獻罕見，甚至部分論文，多為研究者所忽略，至今尚能保持著作為開拓性論著的學術價值。發表在《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上面的文章，雖然有的作者在後來出版的文集中收入，或可從其他書刊中找到，但是這裏的紀錄卻也有其特殊的意義。現在似乎一般文集多不明確交代文章原刊出處，致使研究者在探討學術沿革或學術史研究中，認證混淆，論述無從。即使有重刊出處的文章，

所提供的紀錄，往往也不是可為研究參考所需的原創資料。為了研究工作的科學性，無論在史料，還是在理論、觀念和方法上，俗文學研究都有待於新的突破，或許更應當注意到這裏的資料。

阿英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主編《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前後，先後還整理編校和撰著過二十餘部與俗文學相關的著作¹⁹，更體現了他對俗文學的重視和研究的廣泛。

三、結語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的編輯出版，正處於中國俗文學作為專門研究學科的草創階段，從周刊所刊載的文章中，我們能夠體會阿英對於俗文學研究的重視，以及來源對於整個中國文學史「雅」與「俗」融會貫通相輔相成的理解的編輯思想，從而，扎扎實實地走著一條默默地從事俗文學資料的研究、評價、整理之路。此時的周刊，既富有先導性和初創性，又不免受到當時社會

¹⁹ 戴淑清（署名）：《模範遊記文選》（上海：光明書局，1934年）。錢謙吾（署名）：《青年創作辭典》（上海：光明書局，1934年）。張若英（署名）：《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料》（上海：光明書局，1934年）。阿英：《晚明文學筆談》（上海：時代圖書公司，1934年）。王英（署名）、王慎名編校：《李卓吾尺牘全稿》（上海：南強書局，1934年）。阿英：《李伯元評傳》（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王英標點：《袁中郎尺牘全稿》（上海：南強書局，1934年）。劉大傑編校，林語堂、阿英同閱：《袁中郎全集》（上海：時代圖書公司，1934年）。王英編校：《晚明小品總集選》（上海：南強書局，1935年）。王英編校：《明人日記隨筆選》（上海：南強書局，1935年）。阿英編校：《現代十六家小品》（上海：光明書局，1935年）。阿英校、序：《庚子國變彈詞》（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阿英校點：《袁小修日記》（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35年）。〔明〕袁宗道著，阿英校點：《白蘇齋類集》（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35年）。〔明〕張大復著，阿英校點：《梅花草堂筆談》（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35年）。〔清〕金人瑞著，阿英校點：《唱經堂十子書彙稿》（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35年）。阿英編選：《說明四十家小品集》（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36年）。阿英校點：《西湖夢尋》（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36年）。〔明〕葉紹袁著，阿英校點：《葉天廖四種》（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36年）。阿英編選：《晚清小品文庫》（上海：大江書店，1936年）。阿英：《小說閒談》（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阿英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卷》（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阿英：《彈詞小說評考》（上海：中華書局，1937年）。阿英：《晚清小說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政治環境和學術發展狀況影響的制約，自然突顯出一系列與社會歷史條件相結合的時代特點。其一，周刊始終貫徹學術為本的學術思想，這一特徵是由刊載的全部內容充分體現出來。其次，刊載文章的內容，既順應時代的需要，詳過去之所略，論述前人所未言，又在學術研究層面上推動俗文學研究的傳播和發展。而在拓展中國文學研究新領域、引進新的研究方法為中國文學史新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史料和理論支援。實際上，周刊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一個傳播途徑和研究園地而存在和發展的。再則，周刊中一些文章均較貼近現實，研究探討實際問題者占有一定比例。「五四」之後是中國人文科學研究發生變革的轉折時期，周刊相應地發表了一些研究文章，討論新文學的現實問題，現實性與學術性交相為用。以上幾點值得肯定的特點無疑對探討俗文學於社會的貢獻，以及中國近世新學術的發展，已給予了有益的歷史啟迪。

《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作為第一個類似學院派精神的專門研究俗文學性質的學術周刊²⁰，是我國俗文學學科建立之時最早創刊的俗文學研究周刊，對於俗文學研究的推動，使其向系統的、專題式的和問題式的學術研究類型展開，無疑起了推動作用。對此，俗文學研究的學術界亦應有所共識。雖然在《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之前，其他編輯出版周刊內有研究俗文學的內容，但他們都有各自特定的歷史特性和局限性。如果說草創中的《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對於俗文學研究因學術傳統與新潮觀念的差異而形成的諸如史觀、史料、史纂以及體例等方面尚存在著未完備的缺憾，也正如趙景深指出「這刊物與以後港、滬、平的『俗文學』不同的地方，即在於它兼收通俗文學的作品，不是單純提出遙遠不可即的學者面孔」²¹。那麼，繼承它後來出版的「港字號」、「滬字號」、「平字號」《俗文學》周刊，彌補了它的不足之處，則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²⁰ 「所謂學院派精神不就是一種在學術研究中能頂住一切干擾、堅持貫徹唯真理是尊的精神嗎？」見錢谷融：〈序〉，高恒文：《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3。

²¹ 見趙景深先生在〈「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學」——兼談滬版俗文學刊物三種〉一文，北平《華北日報·俗文學》第68期，1948年10月15日。